

問題與研究

本 期 要 目

論聯合國	蔣廷黻
美國與冷戰	張貴永
從大陸經濟危機看共匪之前途	劉岫青
評黑魯曉夫最近的經濟言論	呂律
美機偵察古巴問題之分析	陳紹賢
蘇俄對外滲透之陣容及其活動	關素賢
明初的對日外交	余又蓀
動盪中的韓國政局	朱少先
聯合國集體安全的演變及新發展	陳世昌
東南亞緊張張聲中看北越	尹慶耀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所 印 行

第三卷 第八期

五月十日出版

目 次

論聯合國	蔣廷黻	(1)
美國與冷戰	張貴永	(6)
從大陸經濟危機看共匪之前途	劉岫青	(10)
評黑魯曉夫最近的經濟言論	呂紹賢	(14)
美機偵察古巴問題之分析	陳紹賢	(22)
蘇俄對外滲透之陣容及其活動	關素質	(25)
明初的對日外交	余又蓀	(31)
動盪中的韓國政局	朱少先	(39)
聯合國集體安全的演變及新發展	陳世昌	(42)
東南亞緊張聲中看北越	尹慶耀	(48)
東地中海的戰略重地——賽普勒斯	陳壽恆	(55)
共匪發動「學習解放軍」運動的分析	王 蘊	(61)
匪俄掃盲教育之比較研究	汪學文	(63)
蘇俄動態述評	一 心	(68)
① 加強高等學校科學研究。		
② 歐俄南部空前水災。		
③ 俄共中央幹部學院。		
④ 重申農場自行製定計劃制度。		
⑤ 明年起免新興國物品進口稅。		
⑥ 俄義關係。		
⑦ 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		(70)
編後記	編 者	
西德慕尼黑蘇俄問題研究所簡介	伯 淵	(40)

論聯合國

蔣廷黻

編者按：我駐美大使蔣廷黻博士應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之邀請，曾於本年四月十日假台北市中央日報大廈五樓，發表返國後的首次學術講演，出席該所董事、全體工作人員、新聞界及來賓等共三百餘人，由該所代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吳教授在致辭中，推崇蔣博士為馳名國際的學者外交家，他對蘇俄問題的研究，已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蔣博士在擔任我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期內，正是我國對匪鬥爭在外交上最艱困的階段，而蔣博士在聯合國以內每次的外交鬥爭，均能堅守立場，維護我國的利益。尤以控蘇案在聯大獲得通過，不祇是我國外交的勝利，也是自由世界打擊國際共黨的一個里程碑。吳教授繼指出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成立，除了致力於一般國際局勢問題及經濟問題的研究，同時更注意搜集匪俄資料加強對這方面的研究。多年以來，該所的工作，一直得到蔣博士的鼓勵，尤以此次中美教育文化基金會在北開會，會中得到蔣博士的推薦，使該所的中請補助案，獲得基金會的通過，因此特別感謝蔣博士的倡導與支持。吳教授致辭畢，即由蔣博士發表講演，其講辭紀錄經該所整理并徵得蔣博士同意送本刊發表，茲誌其全文於次：

主席、各位先生：

我想同諸位談一談「聯合國」。我自己在聯合國服務十五年，我想根據我的經驗，把聯合國這個機構加以分析，同諸位討論一下。在沒有談聯合國以前，我有幾句話先要說一說。最近我在美國，看到不少國內的刊物，報紙上的文章，雜誌的文章，尤其有關國際問題、國際關係研究的文章。我在外國常常有一種詫異，國內的圖書雜誌不完全，並且出國旅行參觀的機會也不多，諸位先生在這個地方研究國際問題有很大的困難。但是我在報紙上、雜誌上讀的文章，我往往感到我們中國人真正是聰明的人。在我們這種環境下，諸位的研究，往往有很深刻的認識，很恰當的分析，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那麼當然啦！我常常拜讀「問題與研究」這個雜誌，我對這個雜誌的成績很佩服的。我不是說所有的好文章，都在「問題

與研究」，別的刊物也有。不過「問題與研究」這個刊物的水準很高。所以，今年國際關係研究所提出一種請求，說是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幫助這個研究所補充設備，將來或者還請幾位出國參觀。我覺得這件事情值得文化基金會幫助。因此我把這個情節向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說明。董事們一致同意，就諸位所申請的原來這個數目撥款三年，幫助諸位先生達到你們自己的任務。

大膽的研究·客觀的分析

國際關係，無論好還是壞，國際變遷無論有利或不利於我們，我們是逃不脫的。所以我們必須平心靜氣地去研究。我剛才說過，我覺得我們對國際問題的研究，成績是不錯的，水準很高。可是也有可以值得改良之處。大體上說起來，我們還得進一步的使我們的

研究分析客觀一點，我們應該進一步認識對方的理由、對方的利害和關係。對於國際關係方面做文章，我想往往會發生一個困難，就是在執筆的時候，感到假如據實報告，或者會影響到國內的民心士氣，因此爲維持這個地方的精神，便不得不粉飾一下。在相當範圍之內，這一點，我是可以了解的。不過有的時候，我們就要知道，假如民心士氣，要用這種方法來維持，那我感覺，這種民心、這個士氣，是經不起風波的，也是很危險的事情。所以我個人看起來，覺得我們普通的時候，雖然有風波，風波不大的時候，我們應該請國內的同胞，重視這種風波，不要粉飾。我們有困難，就承認困難。這樣我們就可以鍛鍊我們的精神。萬一國際上還有更大的風波，我們就可以站得住。假如我們小風波都站不住，大風波一來，怎麼得了呢？無論是什麼國家，不單單是我們，都經歷許多風險。我在美國這麼多年，國際上這麼多變化，對美國也有不利的，也有利的。他們辦外交的人，也常常搖頭感到不順利。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以爲有什麼不利於我們的事情發生，這是一個不體面的事情，沒有先例的事情，以爲是我們單獨有的事情，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的。世界上變化的事多的是，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政府，可以担保全世界的一切變化，只對它有利，不得對它們不利呢？這是做不到的。所以在沒有討論今天「聯合國」以前，我貢獻一點意見給諸位，我希望在國內關心國際關係的，進一步的研究，大膽的研究，客觀的研究，使國內同胞了解我們處境困難，預爲我們同胞可以經得起風波。

那麼，好啦，現在我想同諸位談談聯合國。第一點請諸位注意的，我們雖然有了這個聯合國，但我們的通常外交仍舊存在。通常外交就是各國政府派使節駐在別的國家，這種外交機構的設置由來已久。現在雖然有了聯合國，通常外交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不可誤會，以爲聯合國已取代通常外交，事情不是如此的。聯合國是於通常外交之上加一機構。

聯合國與通常外交的區別

那麼？聯合國與通常外交有什麼區別呢？它有好幾個區別。第一、聯合國所採取的方式是會議的方式，遇有問題就開會，通常外

交則不然，它大都是兩面磋商或會談，所以這是方式的不同。其次，聯合國有一個憲章，所有的會員國最低限度有一個共同理想，因此聯合國這種外交不是普通外交，只講各國的利害。各國的利害關係當然要顧到，但是只要一個問題到了聯合國裏面去，這一問題的解決就必須顧到憲章；換言之，必須顧到會員國的共同理想。共同理想不只一個，它有好幾個，例如：應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不可使用武力，這是其一。其次，遇有土地或領土爭執，憲章規定應該以當地人民的意志爲意志，這就是人民公決，由當地人民投票決定，不可以把一種決定強加諸一個地方人民的身上。所以根據聯合國憲章，各地人民都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這也是憲章裏最基本的一個原則。此外，在聯合國裏面，有先進的國家，有落後的國家；有工業發達的國家，也有工業落後的國家，這些國家都應該彼此合作。先進的國家應該幫助落後的國家，工業發達的國家應該幫助工業落後的國家。所以目前聯合國的憲章與從前的「國際聯盟」有一點不同，我們現在已加上了一個「社會經濟理事會」，有關這方面的工作聯合國是很重視的。我要請各位注意，聯合國這一機構當然是屬於外交範圍之內的，但它都不是代替以往我們通常所謂的外交機構，它是在通常外交機構以外的，也可以說是在通常外交之上加上這個特殊組織，以會議方式，抱着共同理想，來解決國際問題。

那麼，現在究竟世界各國對於這兩種外交抱着怎樣的看法呢？一般會員國對於「聯合國外交」與「通常外交」兩者究竟重視那一個呢？

世界各國並不太看重聯合國

諸位先生，請仔細想一想！雖然聯合國每次開會都在世界各國的報上很有位置，但是仔細去觀察一番，現在世界各國還是注重通常外交，並不太看重聯合國。講到在會員國裏面最重視聯合國的，那當然首推美國，但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現在不過一百幾十個人，而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則爲二千人，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亦有三百人，我相信美國駐我國大使館，其人員之多，其經費之大，定不亞於其駐聯合國的代表團。諸位對這一點請不要忽略。至於英法等國則更甚，因爲他們一向不重視聯合國，他們主要還是重視通常外交。

拿英國駐華府大使館來說，其重要性、其經費之大、其人員之多，十倍於它駐聯合國的代表團；法國也是如此。現在，在聯合國以外有各種的同盟條約。北大西洋公約是其中之一；我與美國的互防條約也是一種；東南亞公約亦然。所以在聯



合國以外有許多所謂區域性的組織，或為雙方面的同盟，或為多方面的同盟。這些組織與同盟與聯合國的存在或不存在都毫無影響。它們花在這些機構上面的經費百倍於它們花在聯合國上面。你如果問那些歐洲國家：你是否靠聯合國保障你的安全？無疑地，它們的答復是「不」，他們不能靠聯合國，他們靠北大西洋公

約(NATO)組織。當然談外交總離不開外交辭令，說話總有幾分保留，如果你不去深入地觀察，很容易得出一個不真確的印象，以為今日世界各國都是依靠聯合國的。

我國最推崇聯合國

至於各國對聯合國的態度，大國如英國者對之平平淡淡，有聯合國這一機構也好，要英國捧捧場也可以，但總是平平淡淡而已。法國則更差一點，它認為聯合國可有可無，有時甚至認為，沒有聯合國這一機構恐怕還要好一些。蘇俄則抱着「有則利用之，沒有天下一樣太平、一樣過日子」的態度。所以，在所有會員國中，最看重聯合國的首推美國，其次則是我們中華民國。而且唯獨我們在憲法上明文規定，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以聯合國的憲章為依據，沒有第二個國家在憲法上做到這樣程度的。所以，無論如何，在精神上我們擁護聯合國可以說是世界第一。美國人在各種外交場合上對聯合國的說法是不十分具體的。美國有兩種心理因素：第一、羅斯福總統抱着一種理想，他真正相信，人類的前途靠這一機構，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所以他的理想在憲章裏面實現了；同時也有許多美國人覺得，聯合國憲章是了不得的，是一崇高的理想，我們必須擁護這一理想，所以美國人擁護聯合國，一部份是由於羅斯福總統的關係，同時也可以說一般美國人是相當崇拜理想主義的。第二、從聯合國創立伊始一直到今天，美國在聯合國中的勢力很大，現在稍差。在六、七年以前，美國在聯合國大會簡直可以掌握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因此美國政府大可運用這一機構，正如中國的一句俗話「挾天子以令諸侯」，它很可以運用聯合國。例如韓戰，它就打着聯合國的旗幟，因為美國在聯合國裏面有這種實力可以把握住。所以他們把聯合國捧得很高。將來，如果一旦美國在聯大把握不住多數票，我敢担保，那時美國對聯合國的熱心一定要往下降。再如，瓜分巴勒斯坦成立以色列國一案，當時美國如在聯大抓不住三分之二的票數，這一案件是通不過的。所以以色列的成立靠聯合國，也靠美國的大力支持。現在，美國對聯大的掌握不及當年，它不能保證在一切問題上面都可以把握三分之二的票數，但也不是絕對沒有

希望。加以美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史蒂文遜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們像往年一樣替聯合國鼓吹。

檢討聯合國的成敗得失

現在我想同諸位檢討一下聯合國的成敗得失。這一問題實在是很難很難的，很難下斷語。我們用幾個實在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首先，印尼獨立案：這一案子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過的，表面上看起來，荷蘭殖民地的取消應歸功於聯合國。可是研究一下，事情并不如此簡單。因為當時如單靠安理會的投票，這一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它還是由在聯合國的後台，美國人告訴荷蘭人，這仗是不應該繼續打下去了，如果荷蘭堅持，美國是無法支持的，也不能給予援助，請荷蘭把算盤打清楚，看荷蘭的經濟與人力能不能打一個長期的戰爭。荷蘭當局經過詳細的考慮，終於接受美國的勸告而退出印尼。所以這一案子你是怎樣去分析呢？你可以歸功於聯合國，因為這是安理會通過的決議案；但你却不可忽略美國在幕後的壓力，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見，印尼獨立一案是不是聯合國的成敗，這是很難說的。

其次，關於印、巴喀什米爾之爭一案：這一問題安理會也有決議，由當地人民投票自決，Self-determination 或 Plebiscite。有一個時期，印度好像願意接受安理會的決議，但後來又變了，不肯接受。當時聯合國以為印度接受，就把全民投票的辦事員都指定好了，並聘請美國二次大戰時的海軍總司令尼米茲上將擔任該邦全民投票事務的執行長 (administrator)。當時尼氏已準備出發上任，但印度政府却說：「閣下慢一點來罷，此刻來不歡迎」。直到今天，尼氏不能去，聯合國這一決議案仍是一紙紙上具文而已，喀邦問題仍未解決。對於這一案子你又怎樣去解釋呢？是不是說聯合國對這一問題是失敗了？這也很難說，因為問題雖未解決，但最低限度印巴兩國尚沒有打起來，雙方還是僵持在那邊。

裁軍案十數年來毫無成就

此外，裁軍案：根據憲章，聯合國有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那就是裁軍 (disarmament)，促使世界各國減少軍備。因此，在聯

合國創立伊始，就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一個是關於通常軍備 (conventional armaments) 的裁減的，一個是關於原子武器 (atomic weapons) 的廢棄與裁減的。我初到聯合國時，那就是創立的第二年，那時這兩個委員會天天開會，當時我以為這兩個問題特別重要，所以仔細加以研究，每次開會都出席。可是，諸位，裁軍問題自聯合國成立迄今，實際上說毫無成就、毫無進步；今天他們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是十數年前所討論的老問題。

在我初進這兩個委員會時，裁軍問題的關鍵在那裏呢？當時，蘇俄與美英等國都一致同意，大家應裁軍，而且強調，我對裁軍的熱心在你之上。所以雙方對裁軍這一理論是沒有爭執的，都在唱高調，都在對輿論說話以博取同情。但實際問題是什麼？裁軍不是紙上裁軍，不是專靠決議，而是一定要有一個國際視察制度、一個國際管制制度，然後始可真正裁軍。如果我們訂立一個條約，規定每一個國家都裁減軍備三分之一，大家都同意了、簽字了；但誰知道他真正裁了三分之一呢？難道就可依照各國的口頭報告來算數嗎？所以西方國家認為，這是不行的，非要有了一個國際組織到當地去視察監督不可。因此，International Inspection or Control 變成了裁軍的核心問題。

蘇俄方面則認為，什麼國際視察或國際管制，還不是西方國家想派間諜到蘇俄這裏來，目的是要謀情報的方便而已。蘇俄的軍備或軍隊裁就是裁了，不許聯合國派人來視察或控制。諸位試想，這豈非渺茫？誰能相信？尤以「原子」這樣東西，更難以捉摸；要設法控制通常武器 (conventional armaments)，所謂通常的陸海空軍，還比較簡單；要設法控制原子武器則是難之又難。如果一個國家把飛彈藏在一個地方，誰能知道？又如一個國家秘密製造原子彈，繼續不斷製造，誰能担保你能發覺？所以關於「原子」這東西，非但必須要有國際視察與控制不可，而且非要有非常嚴密的國際視察與控制不可。

現在，訂了一個協定，大家同意不在地面上及太空中試驗原子彈，這可說是裁軍已有相當發展、相當進步。不過，就蘇俄與美國方面說，他們在太空中試驗和在地面上的試驗已到了相當程度，他們可以不再試驗；但法國則不然，他拒絕在這一禁試條約上面簽字。所以在聯合國辯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好了，蘇聯、英國、美國已有原子武器，法國算是第四個想要成爲原子武器的國家。那麼美

國和蘇聯說，我們現在要停止了，這個原子武器太多了，很危險！現在已經有三個原子國家够了！不要太多了。我在聯合國做中國代表，我從來不附和這個言論，我不贊成的。我說天下有什麼道理，說有原子的國家只要二個，只要三國，為什麼不能有第四國第五國？有一個時期，有原子武器的只有一個美國，美國當時給聯合國提議，說是願意把原子武器廢棄，把原子技術供於全世界，只要別的國家不走這個路上去，不要來製造原子武器。蘇聯不答應，蘇聯為什麼不答應呢？他說不錯，你把武器拿出來分析，但是你保留製造原子彈的技術，假如我接受這個提議，我就永遠不能有這個技術了，那麼，你是超等國家，我是二等國家，我不能接受。好啦！蘇聯不接受怎麼樣呢？大家沒有話說，只好聽其自然，所以蘇聯就變成第二個原子國家，以後英國也變成第三個原子國。英國變成第三個原子國，有人說話沒有，沒有。今天法國來了，要做第四個原子國家，他們就說不行；我說，我看不出理由的。那麼他們說，唉！這是很危險的，這個新起的原子國家，如果拿到這個危險武器，到了手裏蔓延起來怎麼得了？我說當然是有危險，不過該知道老原子國家真正能給我們什麼担保老的原子國家不濫用原子武器呢？你怎麼會想像新的原子國家不負責，而舊的就負責？我看不出來。那麼好了，到這個階段法國不理他們，他往前儘趕他的。諸位都知道，現在不能限制，將來世界上原子國家總不僅是三個四個，世界上總還有第五、第六、第七的。最近，我有的時候沒有事情，我看看我們的明史，明朝歷史。我看了一段很感到有意思。我不記得那一年，明朝有一個人提議說是我們要設三個廠來製造火藥，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太原、還有一個什麼地方。皇帝批下來不可以，只能在北京設廠，別的地方不可以。因為火藥是國家的大機密，要保藏這個機密，只可在一個地方設廠，這是第十五世紀的事情。你看這個（explosive）炸藥，那個時候祕密只有中國有，那麼以後慢慢變成世界共有的。今天原子武器初起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個了不得的武器是祕密，久而久之，這個祕密就不存在了，所以關於裁軍方面，我看聯合國成功很有限很有限。我也不敢說毫無成績，我敢說成績很有限很有限的。

聯合國的成就不太大

還有別的方面，聯合國根本是失敗的。譬如一九五六年，蘇聯派兵進匈牙利，這是明明顯顯違反聯合國的議決案，他就派兵出去，他就不管你們決議，你們決議你們的，我做我的，做了以後怎麼樣？無可奈何！所以到了今天，聯合國不但不追究這個案子，還承認匈牙利政府，這個一九五六年以後成立的政府，這個很明顯的是完全失敗的。所以諸位先生，你如果檢討聯合國的成就，這個賬不容易算的。我絕對不願意說一句話，說是聯合國完全失敗的，以我個人看起來，我說聯合國有成功的地方，可是聯合國到今天為止，他的成就不太大，而他的前途，以後對世界的貢獻，究竟怎麼樣？這也是一個不知之數。我不敢說以後這個機構，對於人類的幸福，不會有貢獻，這是武斷的，不敢這麼說的。但是誰敢說，真正人類要靠聯合國廢止戰爭維持永久和平。諸位先生，要知道戰爭是人類幾千年幾萬年的一個問題。人類無論在什麼時代，不論是石器時代、遊牧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封建時代、帝國時代，無論什麼經濟階段、政治體制，人類都打過戰爭的。民主的國家打過仗，專制的國家打過仗。所以你不能說戰爭是人類某一經濟階段所產生的，而別的社會經濟制度就不會產生戰爭。最低限度根據人類歷史的，我可以說，一切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產生過戰爭的。所以這是人類最大的問題。多少博學的理想者、政治家、哲學家，想盡法子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得到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案。就是今天，我們來了一個組織——聯合國，這個組織在短時代內，就把這個幾千年，幾萬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一下子解決了，這是希望過高！我們當然以中國人文化看起來，我們希望聯合國成功的，聯合國所代表的理想與中國的文化相符合的。不過無論諸位先生怎麼看法，無論世界人對聯合國的看法，如果要這樣的理想完全實現，你得要忍受一個機構的存在，以後一切的問題都可以安全，和平是永久的，這是偏於幻想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諸位先生對於聯合國最注意不要抱幻想，也不要認為這個機構不至於有問題，我們還得盡我們的義務，在我們的範圍內幫助聯合國去發展。現在聯合國所擔負的責任太大，這不是它今天的力量就可以達到的。

美

國

與

冷

戰

張 貴 永

在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就開始努力，不計成敗以求蘇俄和西方各國能在這個世界上比較安穩而且不太緊張地共存下去。這裏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緊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就開始的；第二次努力則始於史達林去世的那一年；第三次努力歷史學家認為應從前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以後開始。

在這期間，蘇俄所從事的外交冒險和談判一直是令人憎恨的。這種攻擊性的外交冒險可概分為兩個時期，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史達林時期，另一次則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黑魯曉夫的外交攻勢。為着明瞭目前所處的境地，為着探求成功的希望和條件，回顧過去大家熟知的情形，或可收

前車之鑑的效果。

我們應從史達林格勒說起，當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在望時，由於蘇俄曉得戰後的紊亂不可避免，她已經積極在準備趁火打劫，事實上，俄國的共黨政權就是從混亂中滋長的；大戰結束後，雖然蘇俄本土到處一片瓦礫，滿目瘡痍，共黨統治者仍把戰後的混亂視為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利用紅軍來達成這種野心。

這種擴張的成敗自然是決定在於美國會不會運用其強大的軍力加以遏阻，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這一年間，史達林根據羅斯福總統告訴他的話，判斷美國在戰後無法繼續維持海外軍力兩年以上，而美國有關歐洲和中國的談判更是在片面的草率復員下進行的。

史達林估量他頗有成功希望的機會，沾沾自喜之餘，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一篇激烈演講詞裏，明白表示未來的時日將是共黨勢力擴張的機會，所以他先在西方發動一連串的攻击，然後又把目標轉向東方。在西方，史達林雖然在伊朗遭遇挫折，却對土耳其迭施外交壓力，一九四六年夏天更對土耳其橫加威脅；在希臘，蘇俄積極支持游擊戰，在義大利和法國，共產黨則致力於攫取其對東歐的全面控制，在九月份成立共產黨情報局。在布拉格，史達林又成功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但在布爾格勒，他失敗了，狄托在一九四八年六月聲明背棄莫斯科路線。

但在一九四七年年初，西方也以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發動了反攻，一九四八年四月的選舉挽救了義大利。在希臘，由於希臘人的努力和共黨本身的分裂，他們沒有能成功；法國也成立了一些力量足以治理國家的中間黨派，壓制了國內共產黨的威脅。

一九四六年春天，德國趨於分裂狀態。到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廿日蘇俄退出柏林管制委員會，就造成了一個僵局，此後三個月蘇俄在地面實施封鎖，禁止西方國家軍隊通過東德進入西柏林，但空運的成功阻止了史達林這項向西方的主要進擊和推展，蘇俄這種交互進展的攻擊性行動結果不但產生了馬歇爾計劃、布魯塞爾公約（一九四八年九月）、北大西洋公約（一九四九年三月），也促成了與西柏林密切連繫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誕生。

正當此項決鬥在西方進行時，史達林在東方又發動了一項攻擊，這項攻擊行動大約是從一九四七年九月，日丹諾夫出席亞洲共產黨召開的共黨情報局會議下達是項命令時開始。但共黨在中南半島所從事的游擊戰爭却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就已開始；在緬甸的游擊戰開始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在馬來亞，開始於當年六月；到了秋天，這種游擊戰已蔓延及印尼和菲律賓。印度和日本的共產黨雖較少從事游擊戰爭的機會，却在一九四八年極力標榜其好戰的驢武政策。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國大陸赤化，當時毛匪的政治軍事戰略就完全由共黨情報局在亞洲各地進區推行，這種游擊戰爭自始就在亞洲各地進

行。一九五〇年年初，史達林和毛澤東的會議無疑的更確定了共黨在亞洲的野心陰謀，果然，當年六月北韓共黨入侵南韓，史毛陰謀達到了高潮。

美國與聯合國抵制北韓對南韓的侵略，在仁川實施兩棲登陸，擊敗共軍，進逼鴨綠江，中共參戰後，聯合國在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五月間抵抗中共人海戰術的成功，漸漸地截止了共黨在亞洲的軍事或類似軍事的侵略。莫斯科和北平都不願繼續這項全面戰爭，因為在韓國所付出的代價他們無法再負擔下去。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間共黨所企待的光明希望至此黯淡無光。毛澤東也從此迭遭敗績，印尼、緬甸和菲律賓相繼制服了共黨游擊隊。在馬來亞，英國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控制了叢林游擊隊的出沒。只有在中南半島，共黨的活動繼續不輟，但史達林一死，和美國之可能介入迫使胡志明在最後只獲得一半的勝利（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劃分南北越）。

當一九五一年韓戰停戰談判開始時，自由世界所處的境地如何呢？史達林已經堅定地控制了東歐，毛澤東則竊據了整個中國大陸。但東西方力量的平衡仍操在自由世界的手中。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各國對共黨計劃策定的希望，提出了對三項基本問題的答覆。第一，由於美國對歐洲的援助，戰後的美國經濟復興推翻了羅斯福的不幸預測和隱憂。第二，西歐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重建了起來，經由美國的援助，西歐各國，無論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都已恢復了元

氣，因此就能在東地中海、義大利、法國和北平抵禦共黨的進展。第三，在韓國，表現出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有着堅強的意志和力量越過冷戰的停戰線，憑藉傳統武力來對付侵略的行動。

從一九五一年夏天到一九五七年十月蘇俄發射第一顆史潑尼克人造衛星，這一段期間顯得比較安靜，其中雖曾發生蘇彝士運河事件和匈牙利抗暴事件，但那是起因自由世界和共產集團本身的變動，非由冷戰的緊張所引起，正如蘇俄的政策計劃人承認的，戰後擴張冒險的階段已經過去，（所以，一九五二年十月在莫斯科所召開的第十九屆共黨大會曾經提出一項見解，反映出制定一種新的長期的共黨策略的思想，）接着史達林去世，蘇俄內部的權力鬥爭帶來了四年的平靜。一九五七年黑魯曉夫控制了所有黨政機構，蘇俄的政策和對附庸國家的控制也作了重要的改變，因此一九五六年十月波蘭產生了戈慕卡政權，年底爆發了匈牙利革命。

西方各國也曾設想過達成調解的可能性。中南半島的戰事已正式結束，蘇俄默許了的里雅斯德爭執的解決，奧國也獲許成爲中立國（一九五五年七月）。但在另外兩大問題上——裁軍問題和德國問題——却始終未獲解決；一九五五年的高階層會議未產生重要的結果，接着在德國召開的四國外長會議（一九五五年十月）也竟無成果。一九六〇年五月因爲召開高階層會議，表面上似乎持續的緊張已經稍爲緩和，但是C-I-事件又使那次會議流產，世界局勢重新緊張起來。

回顧五十年代這十年中，國際緊張局勢之所以不能緩和，實在是因爲有兩個新的因素存在：

第一個因素是在這十年中發展了熱核子武器，並且可以用火箭作長距離的投射。蘇俄首次被認爲力足毀滅西歐，並造成美國的大規模直接損害，因此莫斯科據此認爲可以迫使西方作外交上的讓步，因此蘇俄的核子敲詐政策第一次出現在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危機中。

第二個助長蘇俄希望的因素是亞洲、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主義革命與希求現代化革命的加速進行。蘇俄認爲這是藉顛覆和進行游擊戰爭，來擴大他們在這些地方的共黨力量 and 影響的最好機會；他們以貿易與俄援來煽動這些地區的反殖民地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情緒，誘使他們相信共產主義不但足以對抗美國，且是促成低度開發地區現代化的最有效方法——雖然這種方法是殘忍的。一九五五年售予埃及軍火及簽訂興建阿斯萬水壩就是蘇俄根據這項政策所作的第一次努力。

但是，一九五七年蘇俄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後，又發動了戰後第二次的共黨攻擊。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會對柏林情勢向西方發出最後通牒。河內的北越共黨也宣稱要對越南進行游擊戰爭。緊接着的是寮共得到北越共黨的支援，復起蠢動，準備攫取寮國，在史潑尼克發射以後的這一年中，蘇俄更想利用機會使剛果成爲共黨在中非洲活動的大本營，接着，蘇俄投資十億軍援，唆使印尼在

西新幾內亞與荷蘭衝突，自然他們也加強了對印尼的影響力和共產黨在印尼的地位。令人驚異的是，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卡斯楚獲得了古巴的政權。

發射人造衛星以後，蘇俄的進展為美國兩項主要而成功的行動所遏阻，那就是九五八年黎巴嫩與約旦的邊境糾紛事件與金馬危機。但是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黑魯曉夫在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又有了相當的進展。

一九六一年加諸甘迺迪政府的第一個考驗就像杜魯門政府在一九四七年所面臨的挑戰一樣——擊退共黨的擴張和進展，民主黨政府認為一九六一年五月寮戰的停火和一九六二年十月應付古巴危機，這兩項工作都經圓滿完成。

應付蘇俄政策的第一步行動——是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美國在柏林事件中所採的堅定立場，特別包括一九六一年七月甘迺迪總統的演說和嗣後的軍事宣傳。一九六二年蘇俄阻止西方盟國由空中走廊進入柏林的意圖失敗以後，莫斯科知道要直接破壞西方盟國在柏林的地位是極為困難的，因此他們轉而在古巴投下飛彈賭注，這項行動的後果很可能使整個自由世界的利益在核子戰爭的威脅下投降。

應付蘇俄政策的第二步行動——關於西方國家試圖阻止蘇俄在低度開發地區的發展的可能——可謂名目繁多，在寮國，表面上阻止了寮共的進展；在越南，從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起實行大規模的戡亂計劃；在印尼，

促使荷蘭與印尼政府有關西新幾內亞問題談判的成功；在非洲，美國對新興國家賦以極大的注意力——特別是支持剛果進入聯合國的努力。在拉丁美洲，她與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合作，孤立共黨古巴。

一九六二年秋天，古巴飛彈危機結束後，雖然在古巴與東南亞仍有尚未解決的危機存在，蘇俄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以後的黑魯曉夫的進展自此已告終止。

在這期間，曾經出現足以影響蘇俄未來政策的新發展，第一，西歐國家的經濟繼續在驚人地成長着，從一九五四年以來就無可匹敵，這會使他們變成擁有核子武器的強國地位。

第二，除了美國對付蘇俄在低度開發地區的發展的努力以外，這些地方的國家和人民都能憑藉日益進步的技術與決心以及對共黨目的與方法的清楚認識，來維護他們的獨立。雖然，在亞洲、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由於共黨的騷動仍然動盪不安，但這些地方最近發展的趨勢將使蘇俄控制這些地區的意圖更難實現。

第三，在共黨集團裏，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的衝動——特別是俄匪的分裂，但其他地方亦然——粉粹了國際共黨活動的思想統一與組織紀律。這項分裂的過程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依中共最近的計劃看來，可能有將會在最近擁有獨立核子能力的可能。

了配合戰後的擴展，重工業是必備條件。一九六二年，北大西洋國家的工業成長率平均進展百分之四點八，而共黨集團——中共除外——僅得百分之三點六。蘇俄的此項工業減速，近年來從大約百分之七降至百分之四左右，影響所及將使蘇俄用於軍事、外交政策和國內各項目的力量大為減少，雖然目前在減低之中的成長比率仍然相當的高（美國一九六二年的成長比率約百分之五點四強）。

最後，雖然蘇俄在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以後所採的攻勢頗為成功，且也頗為冒險，但在蘇俄和東歐却產生了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化的趨勢，民族主義的聲勢也日益增強，嚮往和平的心理更是普遍。

這就是戰後所從事的冷戰第三回合的實際情勢的開始。

目前的基本外交爭點和問題與戰後的爭點及問題頗有關連。現今基本的爭點在於裁軍和德國問題；基本問題則在於蘇俄不願在停止軍備競賽上接受高空偵察和國際管制的建議，並且蘇俄一方面從她自己國家利益的立場對中歐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又從主義出發，違反東德人民的意志，硬把東德當做一個共黨國家來佔據。

關於上述外交爭點，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巴魯區曾經提出國際管制核子能力的建議，美國國務卿柏納斯也曾提出自由選舉促成德國的統一，並訂立德國裁軍五十年的條約。

在五十年代中，這個世界已因三國生產的核子武器攪得騷亂不安。為了限制軍備競

爭的裁軍談判就使這項爭點更見複雜，但是問題的癥結仍在偵察方面，艾森豪總統就會在一九五五年提出相互空中監督的建議。同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東德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後，德國問題整個爲之改觀，一九五五年五月日內瓦的裁軍會議，希望重寫軍備競爭的歷史，可是德國問題却種因在全德人民的政治選擇問題和歐洲共同安全系統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一直無法得到解決。

蘇俄不準備在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或在五十年裏，藉國際監督的方法求得其國家的安全，也不準備接受去除由於共產主義在東德的侵蝕所造成的中歐危險緊張形勢的決議。除了這兩項爭點以外，在最近幾個月裏共匪也公開地把幾項問題加諸莫斯科，蘇俄的政策是否只爲蘇俄本身及其人民所制定的？抑是爲了擴張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制定？這是一個切實的問題。

目前，無人能自信地說蘇俄是否準備接受相互監督的裁軍與武器控制的解決方法，也無人能肯定地說蘇俄會不會給予中歐人民自決的權力，促成共同安全的系統。

莫斯科對控制軍備競賽及減少東德烏布里希政權所造成的危險，反對甚力。只要出以耐心，核子禁試這一個步驟可能會導致獲得更大的成果，但是沒有人可以冀望老謀深算的黑魯曉夫和他的嘍囉們會答應作一次革命性的改變，而此項改變實爲安定與和平所需求的。

另外，從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以來的整個

美國與冷戰

歷史給了西方國家好些重要教訓。

第一，莫斯科既然不斷地要想擴張共產黨的制度與力量，所以蘇俄共黨頭子就致力於利用西方國家間的罅隙。因此有關史達林和黑魯曉夫攻擊性行動的幾項基本問題，美國必須準備隨時提出答覆。這些問題是美國保護西方世界安全的承諾必須堅持下去；西歐必須繼續維持其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成長；整個西方世界必須準備有目的地對付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會有一天跨越冷戰的界限，發動攻擊；美國必須繼續在低度開發地區實現其未完成的工作，使這些地區的政府和人民經由美國的協助，能夠維持他們的獨立，並且依照他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意志來建造現代化的社會；總之，西方國家必須繼續加強自身的力量，因爲核子力量才是反核子武器生產的外交與軍事技術。

第二，世界各國與人民能力的開始發展，處於西方國家領導者地位的美國，不但應引導他們尊重別國政府的利益，同時應儘量使他們提出的諮詢能得到滿意的答覆。誠然，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想獲致一項永保世界和平的協議，但美國也同時必須考慮到這項協議的得失，使這項協議不致危及世界上各地的人民。

第三，美國應促使蘇俄以及其他共黨政府體會西方世界正憑藉着自身的努力和談判，使所有國家保持各自的尊嚴，能够追求各自的利益，並尊重相互倚賴的重要性和其他國家與人民的權利。

第四，如果這第三回合的努力能够得到

成功，大家所願意看到的是緩慢而長遠的成功過程，西方國家所求的不是刹那的得意忘形的快樂與成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與五十年代中間這幾年，西方國家深受隱蔽，以爲蘇俄領袖會爲緩和世界緊張局勢而努力，所以，只要世局稍有進步，就誤認已得到和平。美國應該凡事考慮審慎週到，並且表現得較爲強硬一些，以便爲求得真正的和平而努力，核子禁試協定具有重要意義，因爲那是在獲致成功的過程中較難解決的一件事。

大家所面臨的危機如此重大，雙方必須出以深思熟慮和真誠來從事核子禁試的一連串談判。我們不應認爲歷史是靜止的，認爲過去的悲劇和失敗將會在我們手中重演，根據以往慘痛的教訓和經驗，美國和自由世界應永遠保有力量。如果我們能够了解一個問題的真正意義和性質，能够了解團結自由國家力量的價值的話，大家就應該堅忍等待。戴高樂之與共匪建立外交關係，替現階段的冷戰局勢帶來了嚴重災禍。我們在外交上自亦受其影響。這樣一個重大變遷，繼日匪貿易談判與周鴻慶事件而發生，對於亞洲和平關係最爲密切。法國在東南亞所擬推行的中立主義，祇有助長侵略氣燄，對於整個自由世界可以說是絕對錯誤的政策。幸而美國對於法國突如其來的政策改變態度顯明，雖然戴高樂的態度一部分受美蘇關係緩和的影響，我們希望美國能在聯合國支持我們到底，這對於美國本身利益和世界和平都有深遠意義的。

從大陸經濟危機看其匪之前途

大陸經濟危機形成之原因，一為農業減產與停滯，一為俄援之中止。前者基於制度之作用而發生，後者基於世局之發展而發生。因此，危機之出現與加深均屬必然而非偶然。經濟與政治息息相關，經濟危機之持續已嚴重削弱共匪之政治力量，時間於匪無利，克服危機之出路既不存在，共匪政權終必成為經濟之殉葬品。

劉 岫 青

一 「社會主義改造」與經濟危機之初現

為復蘇十二年戰亂後殘破之經濟及安撫各業人民以孤立並消除潛在的政治敵人，共匪在竊據大陸初期會高唱「新民主主義」，一方維持原來農工商業自由經營之制度，同時復對長期阻礙農業發展之租佃關係進行改革，沒收地主出租土地，分歸農民所有。由於此類措施，在三十九——四十一年三年之中，工商業逐步走上復原與發展之過程，農業生產亦獲得了相當的增長。但此非共匪本來願望而僅係應付需要之一時權宜。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之私營經濟的成長，迫使共匪變更時間預定表，提前推行三項普遍與深入之「社會主義改造」（即所謂私營工商業公私合營、手工業合作化及農業合作化），另一方面復以「一邊倒」之姿態，澈底出賣民族利益，乞求蘇俄援助，以分年輸出作價較低之農產品及礦砂之方式償付援款之本息，從此大陸經濟取得了極權與附庸之雙重性格。

四十二年，共匪實施中央集中之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改造」齊頭並進，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十二至四十六年）期內，共匪運用在「土改」及「社改」過程中從民間掠奪壓榨所得之大量資金血汗及乞自蘇俄為數相當一十五億美元之經援（五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星島日報王檄：「中共會脫離蘇俄魔掌嗎？」），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之

工業化。另有三十餘億美元係韓戰時期共匪向蘇俄購買武器與彈藥之費用（中央社東京四月二十九日合衆國際電）。此一工業建設運動亦獲得了相當之成就。據匪公佈統計數字，計劃最後一年（即四十六年）與計劃實施前一年即四十一年相較，工業總產值增長一二八%強，其中重工業（即生產財）增長二〇%強，輕工業（即消費財）增長八三%強，農業總產值增長二五%強，關於農業方面，由於社會主義集體制阻抑了農民之生產意願，加以四十一年以前各年農業生產估計數字顯係偏低。實際可能無何增長，縱有增長亦必在二五%以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農業發展顯已遠落在工業發展之後，形成脫節現象，自將有礙於計劃經濟之順利推行，大陸本以農業為經濟之基礎，國民收入五〇%以上來自農業（四十一年為五九·二%，四十二年為五二·八%，四十三年為五〇·九%，四十四年為五二·九%，四十五年為四八·一%，四十六年為四九·二%，來自工業之部分僅佔二一%至二六%，由於對農業生產之低估，實際上來自農業生產部分之比重應較所引數字為高。資料來源：日本亞洲研究所「中國經濟發展之統計的研究」（四十一頁）。在四十二年年中至四十六年年底四年半之內，人口增殖七千餘萬即一二%以上，顯然農民收入亦已逐漸減少。工業化依靠農業積聚資本、供應原料及消納產品，農業對工業化所擔負之任務日益加重，其完成亦日益趨於艱難。四十五年起俄援本息開始償還，對俄貿易出超逐年增加，更使農業生產不勝負荷。農業停滯，無力與工業繼續增長之

需要相配合，導致大陸經濟危機之初現。

二 生產「大躍進」與經濟危機之

深刻化

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於四十七年。四十六年以擴大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促進農業增產之作物新栽培方法(即密植法)技術試驗獲得初步成功，曾予農業問題困擾之共匪以極大之鼓勵，樂觀情緒使共匪不暇顧及該項新栽培方法所需最低限度之條件是否能夠予以充分之滿足，於是乃有四十七年「生產大躍進」與農村「人民公社」制之狂熱推行，成爲共匪尋求「自力更生」打開經濟死結努力之開端。「人民公社」組成農業產業軍，相當滿足了「大躍進」所需大量人力之條件，但肥料與有效灌溉則極爲缺乏，加以「公社」制較「合作社」制更進一步削弱農民對生產之關心，該年農業產值計劃指標原定增長一倍左右，事實上據匪公佈改正數字，則僅較上年增長四分之一(二十五%)，與投入於農業之勞力作比較，形成極端不合經濟原則與得不償失之現象，農業勞動生產率較戰前低落了五十五%左右，「大躍進」並未使農業爲成倍甚至幾倍之增長；另一方面，由於資源浪費過鉅，人力役使過苛，反招致了持續三年之久，在自由制度下本可避免或減輕之所謂百年未有之自然災害。四十八年入秋以後農業生產「大躍進」因天災蔓延而轉入低潮，四十九年年產量全面下降，糧食產量爲三、〇〇〇億斤，跌至上年之六〇%及四十六年之八〇%，而人口則又較四十六年增加了四千餘萬。

俄援漸減開始於四十六年，是年部分專家奉命撤退，根本停止則在共匪農業「大躍進」全部失敗因而陷入焦頭爛額之四十九年，是年七月俄帝不僅未將四十六年新借五十億盧布撥付分文，且下令將所有留在大陸之一三九〇名專家全部撤走，並撕毀三四三個合同，廢除二五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帶走所有工業建設之藍圖，在對匪貿易方面亦加以限制與歧視，予共匪工業以無比沉重之打擊。

從大陸經濟危機看共匪之前途

由於四十九年農業空前歉收，俄援停止，五十年工業生產受到極不利之影響，基本建設大部停頓，廠礦部份關閉，大部停工待料，情況混亂，重工業生產較上年跌落甚多，輕工業中佔八十%左右之比重，以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爲原料之部份跌至四十六年以下，其中如棉布產量自上年之七十五億公尺跌至二一·五億公尺，較三十九年之二五·二億公尺尚低，膠鞋產量亦自四十七年之一億八千餘萬雙跌至三千萬雙。工業生產萎縮，總產值直線下降，匪區經濟危機普及於工業雙方，並向程度更深刻形勢更惡劣之途徑發展，使共匪對經濟政策不得不作現實與痛苦之考慮。

三 新政策實施二年來之經濟情況

五十年起共匪被迫改變經濟政策，企圖以哀軍作戰姿態逐步克服危機，穩定經濟。新經濟政策之總綱爲「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其精神在於重視農業，重建平衡。新政策具體措施爲逐步進行調整，將經濟比重安排自過去之重工業——輕工業——農業，改爲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重工業實行多種經營，以有效配合農業生產需要爲主要目標；輕工業着重開闢原料來源，以適應農業大歉收後原料奇缺之痛苦環境；對「公社」則：①縮小生產單位，將權力進一步下放，藉以減少經營管理之困難，②提高「按勞計酬」在集體經濟分配中之比重，藉以激發農民對集體經濟勞動之積極性，③正式劃分自留地，准許農民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開放農村集市，藉以發展副食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之生產，彌補社會主義經濟之不足；另一方面復動員一切力量包括勞力、生產資料、電動排灌設備、化肥、農藥、營運資金及部份農村生活必需品等及時支援農業生產，並下放大批幹部至「公社」各生產隊，強化對農民勞動之監視與控制。自調整逐步實施二年以來農工業生產情況略述如次：

農	業
方	面

五〇、五一及五二三年爲災後農業生產恢復階段，其恢復之目標爲四十六年之生產水平，該年農業總產值爲僞幣六〇三億元，主要作物糧食產量爲三、七〇〇億斤(即一億七千五百萬公噸)，皮棉產量爲三、二八〇

萬担。匪自四十九年起對經濟生產統計數字即未公佈，據零星報導及各屆僑人代會公報披露，五十年糧食產量較四十九年有所增加，五十一年又較五〇年略增，五十二年農業全面好轉，糧食產量較五十年為好，經濟作物產量亦較上年增加，至於增加若干，在絕對數與百分比雙方均無數字提及。大陸糧食生產總值估計在全部農業經濟（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在內）中約佔五〇%強，在全部種植業（狹義農業）中約佔七五%左右，如能究明糧食生產之盛衰，大致即可窺見整個農業經濟之榮枯。關於大陸糧食產量數字據英將蒙哥馬利五十年訪匪返國後報導，四十九年產量毛匪面告為三〇〇〇億斤，五十年產量據渠考察各地時目擊情形預測可增加至三、二〇〇億斤，據美國農業部專家估計，五〇年為三、三〇〇億斤——三、四〇〇億斤，五十年為三、五六〇億斤，五十二年為三、五四〇億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估計五十年為三、一五〇億斤，五十一年為三、二〇〇——三、三〇〇億斤，五十二年最多為三、四〇〇億斤。各方數字大致頗稱接近；同時，有一共通點即直至今目前為止，顯然尚未恢復至四十六年三、七〇〇億斤之產量，如以糧食為基礎比例推算，整個農村經濟情形大致已可了然。大陸農業生產在目前低技術水平下，主要決定於耕地與人力之多寡，發展難而恢復則較易，四十六年為集體農業在正常年景下（四十七年「犬躍進」正在高潮，情況特殊，不足為準），生產最高之一年，是年生產之水平既為已經獲致之成就，目前耕地數量無多增減，人力只有較前增加，年來災害亦已較前略為減輕，論理，恢復至四十六年之水平應無如何困難，而實際竟如此緩慢，主要原因實不能不歸咎於社會主義之制度。依目前情形觀察，如不再遭遇特大災害或重大事變，五十四年似可達到四十六年之水平。事實上即令恢復至該年之水平，八年來人口增加當已在一億二千萬以上。此外，尚有一事必須略予說明，即農民私營家庭副業生產，基於農民之勤奮，二十年來確已較開放前有相當程度之增加，致引起部份敏感人士對匪農業生產及輸出能力作出過高之估計。實則私營經濟之迅速發展，必將動搖集體經濟，促其加速崩潰，目前已使共匪不能再事容忍，清算鬥爭正在擴大之中，故其發展可謂已達極限。

工	業
方	面

經濟調整二年以來，據共匪聲稱「自力更生」方針正確，成就輝煌，工業生產五十年已較五十年進步更速，並舉出下列數端以實其說：

(一)五十二年石油化肥及部份與農業生產有關之工業品產量均較上年增長。

(二)以工業品為原料之輕工業品產值有較速增長。

(三)若干工業產品品種花式均較過去增加。

(四)部份工業產品自給率較過去增加。

細閱零星披露之資料，共匪對工業生產強調「自力更生」、品種增加、產品「自給率提高」、及「部份重工業品產量及以工業品為原料之輕工業品產值增加」，而對工業總產值則無一字道及，茲加分析如次：

(一)工業生產發展之標誌為總產值之增長。產品品種增加與產品自給率提高固屬重要，但如總產值未有增長，仍不能反映工業之發展。

(二)部份工業產品品種增加及部份工業產品自給率提高，並不等於全部工業產品品種增加與自給率之提高，且自給率之高低大多決定於供求關係之變動，在經濟停滯或蕭條出現致需要急劇減退之情形下，若干產品自給率提高，並不足以說明該等產品產量或供應已有相應之增加。

(三)工業中約有五〇%，輕工業中約有八〇%均以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為原料，四十九年農業生產空前歉收，五十年工業生產即受其影響而大幅下降，例如棉布產量即降落七一%強，農業生產至今尚未恢復，每年須自購糧食五百萬噸以上而仍僅能維持半饑餓之生活。農產品如此缺乏，原料固告不足，市場亦被削弱，大部份工業均將影響而減產，僅少數以工業品為原料之輕工業產值有若干增長，在整個工業中，實屬微乎其微。

(四)共匪僅就部份工業產品品種增加與自給率提高及少數工業產值增長力加渲染，而不敢提及工業總產值有無增加，顯係具有嚴重自卑感之自欺與掩飾之辭。

(五)共匪本來一面倒向蘇俄，為其附庸，不幸中途被其遺棄，

被迫提出「自力更生」方針，目的僅在作爲一種藉口，以強化對幹部之役使與對羣衆之壓榨。「自力更生」如在自由制度之下，憑藉廣大人民自覺自願之勤勞節約，經過較長時期之艱苦奮鬥，自可獲致相當之成就，但不可求諸於違反人性之社會主義奴役制度。共匪雖高唱「自力更生」，決不可能收到明顯之效果，至謂在二三年內已獲致輝煌之成就，更屬無稽之神話。

依據前述分析，大陸工業生產兩年來一直在調整之中，談不到鞏固與充實，所謂「全面好轉」似尙有一段可觀之距離。

四 共匪之前途

大陸經濟危機形成之原因，一爲農業減產而停滯，一爲俄援之中止。前者基於制度之作用而發生，後者基於世局之發展而發生。因此，危機之出現與加深均屬必然而非偶然。

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制度違反人類追求本身利益與愛好自由規造之天性，使農民對於勞動操作失去興趣，對於生產管理漠不關心，此種消極作用因「公社」之實施而益見明顯。中國大陸農業連年減產，迄今未能恢復，即坐此故。共產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爲其終極目標，社會主義則爲走向共產社會之一個必經的過渡階段，共產黨當然不可能放棄社會主義之制度，但如不放棄社會主義之制度，農業停滯將如影之隨形，永遠無法使其消失。

共匪工業生產之減退與工業體系之動搖，除受農業減產與停滯之影響外，俄帝經援之中止實爲其最重要之原因。共匪現有工業基礎絕大部份均賴蘇俄設備而建成，依賴蘇俄技術而操作。俄援工程項目尙有部份正在建設之中，俄援中止後，大量減少成套設備與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份之供應，加上專家撤退，藍圖帶走，使未建成者幾乎完全停工，已建成並投入生產者亦受影響而不能順利運轉，對匪工業打擊之嚴重可以想見。俄援中止之另一面爲包括軍經援在內相當於六十餘億美元之債務必須分年以物資償還，對於共匪所加之壓力更將產生深遠之影響。俄援之中止爲匪俄關係惡化中若干基本事象之一，而匪俄關係之惡化則爲包括蘇俄兩大勢力之形成，核子

從大陸經濟危機看共匪之前途

僵局之出現，古巴飛彈基地之撤退，和平共存空氣之瀰漫，美俄間熱線之建立，不久前防止核子播散的部份禁試條約之簽訂，以及最近美英俄三國自動減產原子彈原料之宣佈等一連串重大事件在內之客觀的世局發展之必然後果。

大陸經濟危機之出現與加深，既屬必然而非偶然，克服困難解脫之出路自己無發見之可能。在危機持續過程之中，由於共匪竭力掙扎，因獸猶鬥，縱或出現短時間或局部好轉之現象，仍將爲人口不斷增加之浪潮所沖沒，實際上成爲危機進一步發展之預兆，而非危機解脫之開始。蒙哥馬利將軍五十年訪匪返國後曾稱共匪面臨嚴重經濟困難，現正着手試圖解決，尙需經過五十年之時間方能完成（五十年十月十一日倫敦 Sunday Times）。經濟與政治息息相關，經濟危機之持續已嚴重削弱共匪之政治力量，時間於匪無利，克服危機之出路既不存在，共匪政權終必成爲經濟之殉葬品。

本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爲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 (二) 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日截稿。
- (三) 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爲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 來稿請載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載明。
-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評黑魯曉夫最近的經濟言論

呂律

黑魯曉夫每一次改變他的政策，能够說得頭頭是道，是因為他有四個現成的道具：一個是史達林，在他對內有所更張時，就拿史魔作為批判醜詆的對象；再一個是帝國主義，在他對外有所陰謀的時候，就拿帝國主義作為箭靶；至於第三個和第四個道具，那就是馬克思與列寧了，他們那套可左可右的「經典」，成了他自圓其說堵住他人嘴巴的一團棉絮。

壹

本年二月間，俄共舉行兩次大規模有關農業的會議：第一次是二月十日至十五日舉行的俄共中央全會，第二次是二月二十九日舉行的黨、政、農業機關領導人員會議。

在以上兩次會議中，黑魯曉夫都有冗長的政策性言論發表：在第一次會議中曾發表「生產集約化是發展農業的主要方向」的演說（原文見本年二月十五日真理報一至六版）；在第二次會議中曾提「順利實現俄共中央二月全會關於農業生產集約化決定」的報告（見本年三月七日真理報一至六版）。

黑魯曉夫二月十四日的演說，連前言與結語，共可分為十段，其中包括：「蘇俄建設的根本問題」；「走向提高畜牧業產品率的正途徑」；「需要積極而進取的科學成就與先進經驗的宣傳」；「充分利用增加穀物及其他作物的可能性」；「把落後的農場帶到先進農場的水準」；「關於集體農民的養老保證金」；「幾個工業工作的問題」；「完善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關於裁減國防支出問題」。

黑魯曉夫二月廿八日在黨、政、農業機關領導人員會議上所作「順利實現俄共中央二月全會關於農業生產集約化之決定」的報告，共分六段，除前言外，包括：「具體而熟練的領導農場」；「採用先進的技術程序是增長產品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大潛力」；「組織畜產品生產的幾個實踐問題」；「斷然的終止計劃工作中的曲解和領導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中的命令主義」；「蘇俄人民將順利的解決新的巨大任務」；這個報告，他在前言部份已加說明，是欲言其二月十四日演說未完之言。

黑魯曉夫以上兩次有關經濟的言論，總的說來，是講的農業，表面上是講的與農業直接間接有關的問題，實質上是去年十二月全會所決定的「加速發展化學工業案」觸了礁，黑魔不得不利用這兩次會議的機會，力謀疏導挽救。

哈利·辛華茲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紐約時報上發表「黑魯曉夫的經濟計劃」一文說：「……這種極具雄心的化學生產計劃，如果全部被採取的話，那些可能受害的方面早已提出異議。例如軍事領袖、太空計劃負責人，舊式工業部門、特別是從事生產和使用鋼鐵方面的有力領袖們，即會運用壓力反對在他們的計劃項下提出一

切可能的削減。——哈利·辛華茲這段話與黑魯曉夫本人在這兩次言論中所說的互相對照，證明西方的觀察并不是像黑魯曉夫所說「完全是虛構的」，而是事出有因。

貳

從去年十二月的俄共中央全會到今年二月兩次有關農業的會議，使西方日益加深一種印象，即黑魯曉夫在更多的採用西方的辦法，以謀加速發展蘇俄的經濟，這是因為黑魯在兩次全會之間作了太多的政策性與措施方面的修正，其中有關於農業的，也有關於工業的。

首先就農業方面說，黑魯即作了下列五項修正：

一、他承認他提倡以玉蜀黍、甜菜、豌豆為飼料基地并未成功，更修正了他自己祇重視玉蜀黍、甜菜、豌豆這幾種飼料作物和重視草類飼料的偏差。

他在講述如何提高畜產品的產品率時，雖然強調沒有飼料作物（特別是玉蜀黍和甜菜）高度的收成，畜牧業中的集約化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他承認，最近以來有些農場對於種玉蜀黍已經鬆勁，結果這種作物在許多地區中的收成很低，以致青貯飼料儲存的不多。所以然者，不是土壤與氣候的關係，而是不會種和不懂照顧此項作物。據他說，在播種玉蜀黍之中有三種反常的現象：第一、某些農場以大片的耕地種植此項作物，但收成極低；第二、有的農場并不是已經一切準備好要在大片土地上種這種作物，事實上它們也不能種這麼多的玉蜀黍；第三、有些農業工作人員（當係指黨政人員）勉強集體農場種那麼多，而事實上它是它所不能勝任的。

他因為這幾年深嘗飼料奇缺的痛苦，所以對飼料的種植已放寬尺度，不再堅持要種什麼或不要種什麼。他為了保證畜牧業得到飼料，讓集體農民們自己去決定要種什麼及要種多少。他所以作這樣的轉變，是因為他承認好多集體農場適應地方條件所種的羽扇豆、豌豆和各種混合飼料都很成功，因此他提倡在更北的地方可以試種作飼料用的白菜、珠莖甘藍和蕪菁，所有這些都是他過去提都不屑

一提的。

他在飼料作物方面所作的最大一項修正，是當他談到專業化、當眾嘉勉「愛沙尼亞集體農場」的時候，他說：「我知道，愛沙尼亞人此刻坐在那裏而且在想：你說的對，但是你能再將化肥給我們用到草地上的話，我們將獲得更好的指標。」假如說黑魯這幾句話是說在頭四年，他將說愛沙尼亞人是想入非非，因為蘇俄如有餘力的話，祇能將化肥用於玉蜀黍、甜菜和豌豆，絕對不能用於草地，可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黑魯幾年來所大力提倡的并無好的表現，反而不受重視的草地却使他當眾提出誇讚，所以他一面承認愛沙尼亞人這個意見是對的，一面說明：「因為目前化肥不夠多，現時還沒有可能充分滿足所有的需要。」但他當眾宣佈：「我們已懂得化肥對於草地的重要性與意義，并且將要這樣去做，但不是即刻去做。」

二、修正了他過去祇重擴充播種而積忽略土壤改良的偏差。

黑魯曉夫在演說中說：「……我們今天就應當考慮關於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白俄羅斯、烏克蘭近山林地帶、俄羅斯北部各省的土地改良，應該計算一下土壤改良的經濟利益……」。這是在演說中解釋過去偏愛灌溉建設阻土壤改良而現在又提倡土壤改良的理由。他認為國人對他的政策感到迷惑是對的，至於他現在建議改良土壤也不為錯，因為：以中亞細亞為例，改良土壤與灌溉建設，當然以後者為重；若以烏克蘭、北高加索及其他某些地區為例，則又當別論，他認為應該手裏拿着鉛筆計算，在何種條件之下國家和農業的投資可以得到巨大的效能：是灌溉？還是土壤改良？

三、修正了十二月全會盲目高叫農業化學化——化肥第一——的幼稚病。

俄共中央十二月全會給予我們的印象，好像去年農業的失敗，除了氣候條件之外，就是因為未採用化肥、或者採用的太少，今後加速生產化肥、更多的採用化肥，農產品即可依靠化肥而得到滿足。

不到兩個月的功夫，黑魔的口吻改變了，他不再特別強調化肥，而且對有機肥料（即所謂地方肥料）又一往情深起來。在以「有機肥料為體」——「化學肥料為用」的原則下，李森科院士「以少許化肥加入有機肥料之中」的「混合肥料」得到黑魔的鍾愛。他為了減輕在化肥方面所負的重担，為了使與會人士加深對李森科「混合肥料」的印象，從十五年前蘇俄農業部內所發生的一個爭論——有機肥料與化學肥料孰優——說起，歸結到李森科用少許化肥與有機肥料摻合在一起的「混合肥料」被證明使用效果很好，凡採用者都收到很好的收成。黑魔表示，他站在李森科一邊，因此他請求科學家們、農業機關的領導人，再請求李森科把製造有機——化學混合肥料的方法草擬出來，頒發各農場，以供閱讀。他相信採用摻合少許化肥的「混合肥料」之後，每一公頃可以收到三〇公担的穀物。

四、他修正了共黨傳統上不正確的優越感，主張接受西方的科學文明，反對孤芳自賞與固步自封。

在俄共中央二月全會之前，黑魯曉夫曾函請美國一位有名的農場主人羅蘇埃利·加爾斯特為二月全會討論的議題提供意見。加爾斯特所撰「論美蘇兩國農業」一文，俄共中央交「真理報」在二月十三日第六版發表。「真理報」在加文標題之下加註編者的話說：「著名的美國農場主人羅蘇埃利·加爾斯特日前寄來一信，他在信中敘述了自己對於美蘇發展農業的意見。這封信為我國農業工作者感到興趣，因此吾人特將此信刊出，當然，這并不表示我們已同意加爾斯特先生全部的結論，特別是關於某些政治方面的評論，但是他在集約化的基礎上所作的發展農業之分析，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加爾斯特的信，在「真理報」第六版佔了六分之四的版面，內容非常精彩，茲特歸納其三個要點於後：

第一，美國農業發展的過程——據加說：在一八九〇——一九四〇年期間，進步很慢——玉蜀黍的收成每公頃經常停在一六公担的水準上；籽棉每公頃一·八公担；一九三〇年種一噸穀物所費的時間，同一九一〇年時一樣多；從一九四〇年起，美國農業的產品率才急劇上升，每一噸穀物所耗的勞力才開始減少，尤其在戰爭期

間與戰後時期，不但為了自己同時也為了盟友必須生產大量的糧食，於是到一九五五年，美國的一般農場比之東歐（按加所用東歐一字主要指的蘇俄）有其更高的生產率，這一年東歐各國的農業比美國要落後三十年。

第二、美國農業迅速發展的原因——據加說：美國農業所以發展這樣迅速，主要有四個原因：（一）美國祇用十五年的功夫全副普遍採用了玉蜀黍的雜交種，不但以玉蜀黍作為穀物的地區，即以玉蜀黍作為青貯飼料的地區，都採用此項種籽；（二）美國的農業機器已達到驚人成就的地步，過去（即當四二年前加與其夫人結婚時）種一公頃玉蜀黍需要兩小時的勞動，目前一個普通的農場祇需要一六分鐘，而好一點的農場祇需要八分鐘；（三）自五十年代初，美國感到需要更多的糧食，於是在工業加速生產礦肥和農業儘量採用礦肥之下，以致一九三〇年時每公頃祇收一六公担玉蜀黍，到一九六三年每公頃已收到四二公担；（四）一個農業發達的國家，不能沒有優良的四通八達的道路，美國有普遍全國的優良的「由農場到市場」的道路，不論在何種天候之下，農場所需要的化肥、拖拉機燃料及其他材料，隨時可以送達農場，而農場所生產的產品可隨時送達消費中心，并且，美國的築路機器已進步到五——六個人不需勞動一天即可修好一公里的道路。

第三，美蘇農業的比較——據加說：美國已經百分之百採用玉蜀黍雜交種，蘇俄推廣的成績甚佳，將接近美國水準；美國已經是農業機械化水準最高的國家，蘇俄在這一方面却正在力求進步中；美國的化肥已在五十年代建立完成，蘇俄在六十年代才開始建設；美國的道路已遠遠走在前面，蘇俄在這一方面也感需要，必須加速開始建設，徐求進步。

黑魯曉夫在演說中提到加爾斯特的論文時，他不反對加所說美國的化肥和農業機械如何好法，他對加在論文中所提各點，不但同意，而且要求與會人士不要自大驕傲，要接受加對於技術和生產問題所作的勸告。他不否認蘇俄所推廣的雜交種玉蜀黍是加所建議的，也不否認蘇俄的農業生產器械沒有達到美國水準，而有些器械甚至於是從美國學來的；他并且說，現在所採取的發展化學的措施，

也是從加爾斯特新那裏「進口」的。他認為一種好的機器結構，不論它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都是可以成功的爲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用。因爲人人皆知，決定社會制度的不是機器，而是人。關於蘇俄的化肥農藥及其他農業化學品生產，他並沒有具體指出將在何種基礎上趕上美國，祇是籠統的說「在三——四年期間就可趕上美國」。他雖然承認，已不祇一次聽到加爾斯特爲他所作的關於道路的建議，但是他說，目前蘇俄無力把投資用到這一方面，并且按次序說也還沒有輪到這一方面。

黑魯曉夫在結束他對加爾斯特論文的介紹時指出，過去俄共有一種不正確的不分皂白的拒絕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成就的偏差，任何提到個別國家這樣那樣科學成就時，一概視爲崇拜西方。他說：「黨批判過類似的實踐，共產主義建設事業要得到勝利，就是要在爲發展蘇俄經濟的利益而廣泛利用資本主義各國的科學成就。」

五、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取消一切休耕地以擴大播種面積和普遍實行秋耕以縮短春播時間的錯誤，主張在應該有休耕地的地方應任其有休耕地。

蘇俄全國穀物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阿·依·巴拉耶夫（註一）在俄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演說時指出：墾荒邊區冬季的強風，往往把秋天犁耕過土地上的雪吹走，結果，春天的土壤濕度不及四五公分，於是春播深感乾旱之苦。他引該所的研究工作證實：秋季未經犁耕過的土地，保存着收穫以後殘存的蒿草，積存很厚的雪層，使土壤中的濕度大爲增加。巴拉耶夫說，該所實驗農場未從事秋耕的土地，到冬季終了時，最近三年雪層達三五公分，而實施秋耕的土地，雪層祇有一五公分。沒有實施秋耕的土地很少有凍到深達七〇公分的，一到春天凍土隨冰雪的融化而同時融解，融化的雪水通常也不流走而全爲土壤吸收，因此，春播不感乾旱之苦，田中的春小麥收成也高。據巴拉耶夫報告，該所實驗農場在最近三個早年中，凡未經過秋耕的土地每公頃平均收到一一·二公担，經過秋耕的平

均祇收到八公担。

巴拉耶夫也許事先已得到黑魯曉夫的同意；否則，他不會這樣大膽的指出：科學和實踐證明，墾荒邊區保持一部份休耕地，在經濟上

評黑魯曉夫最近的經濟言論

是有益的，因爲在休耕以後，一連三、四年所增加的收成，補償休耕那一年所未收的而有餘。他具體的指出：該所實驗農場在最近三個早年中，春小麥在不休耕的田地中每公頃祇收七·六公担，而在經過休耕的田地中，第一年收一三·六公担，第二年收一一·二公担，第三年收一〇·八公担，共計三年來比未經休耕的土地每公頃所增加的收成爲一二·八公担。

因此，黑魯曉夫在他的演說中說：「在必須有休耕地的地帶，應當有完全的休耕地。」他并且舉出一個事實說：他會到過巴拉耶夫的農場，巴小心翼翼的說，應當保持百分之二〇的休耕地，馬上又修正爲百分之二。當時黑魯曉夫不在場的隨口答應了百分之二〇。在舉行二月全會時，因爲巴說「當然百分之二〇比百分之二好」，於是黑魯曉夫在演說時決定：「如果百分之二〇好一點，那麼，同志們，我們就百分之二〇吧！」

叁

關於工業方面的修正，見於黑魯曉夫演說的第八和第九兩段。黑魯曉夫在他演說的第八段——「幾個工業工作問題」中所談的雖可分爲兩個重點，即：反擊美國中央情報局關於蘇俄經濟成長率的分析及加速發展化學工業一事，但黑魯比較重視的，還是後面的一點。

對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發表的關於蘇俄經濟發展速度業已緩慢下來的分析報告，他拉出列寧手訂全國電氣化以後，即戰前戰後各階段和各重要經濟（特別是工業）部門的統計數字作爲證明，但他所引證的一大堆資料，最多不過證明自一九二〇以來蘇俄經濟發展速度比美國快，却不能證明它不是一個病兒在復原時期必然有的現象，也沒有具體資料證明最近幾年它的經濟發展速度仍舊像過去那樣快。

自去年十二月全會以後一般認爲蘇俄經濟中的比例關係在作着與傳統、與致條不同的轉變——十二月全會的決定修正了工業的發展速度優於農業的發展速度和重工業（第一部類，或稱A組）的發展速度優於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第二部類，或稱B組）的發展速度

——俄共中央十二月全會所造成的印象，不祇在鐵幕外非常深刻，即在鐵幕內及蘇俄本土以內亦復如是。因此，發展化學工業和增加農業生產的計劃，首先受到在習慣上列為優先的那些部門的反對和阻撓。

黑魯曉夫為給他的化學工業計劃爭取一條發展的坦途，不但自己在演說中極盡委曲求全之能事，而且另由A·阿爾楚瑪年院士（註二）在二月廿四和廿五兩日的「真理報」上連續發表「我國經濟的迫切問題」一文，像這樣動搖根本的重要文字，如果事先未經黑魯的同意或者并非在黑魯的指示下所寫的，則「真理報」斷無予以發表的可能。

黑魯在自己的演說中指十二月全會所造成的印象，是「蘇維埃國家的敵人們在全會的決議上攪腦汁所想出來的」。他說：「我們不論什麼時候，從不放棄發展生產資料的工業（即A組——第一部類）」。他指化學工業一直是屬於重工業方面的，因為化學工業不祇是生產消費資料（即B組——第二部類），也生產生產資料。他認為化肥，各種酸、燒碱與苛性鈉、橡膠、塑料、金屬代用品，都是生產資料，而人造皮革、人造毛皮、化學日用必需品等，是消費資料。他力辯十二月全會所通過的綱領不祇是包括消費資料的範圍，也包括生產資料的範圍，所以不應視為屬於A組（第一部類）或屬於B組（第二部類）。他說，把化學看成一個東西是不妥當的：化學既對國家人民在發展重工業方面的利益作出結論，也對蘇俄人民關心迅速增加消費品（諸如食品、衣著、鞋子，各種文化——日用必需品）的生產作出結論。

黑魯在以閃爍不定的言詞解釋十二月全會的決議，企圖達成說明十二月全會并未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而後又進一步拉出列寧故事來，希望那些一向優先的部門加以效法。他說，當俄共驟然取得政權之後，要建立重工業，列寧號召在一切方面節約，甚至在學校方面也不例外。當時全黨堅定不移的實現了列寧的總路線，今後仍當如此，但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點，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能認為是目的本身（即最後目的）。他強調在「開展共產主義建設時期」，重工業將在頗大程度上為滿足個人的需要而工作，逐年增加

設備和輕工業原料的生產，同時將使人民消費品的生產大規模的增長。他最後指出：生產的消費品愈多，也就是積累愈多，也就是滿足人民對消費品的需要及進一步發展擴大再生產的重工業之可能性愈多。

關於經濟中習慣上稱為優先的那些部門反對黑魯變更傳統的比列關係的情況，在他演說的第九段——完善國民經濟計劃工作中有更清楚更具體的透露，而他修改這種傳統的傾向和決策，在這一段裏也更見明顯。他提到俄共中央全會第一次（一九五八年）決定大力發展化學工業受到打擊時說，那個計劃沒有實現，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因為各部門爭取優先。他舉金屬委員會的例子說：這個機構的主持人就對化學工業不大關心，他們所想到的是如何發展五金。除此之外，由於下年度計劃的編製和投資的分配習慣上以各部門上年度所達到的水準為依據，所以某一部門假如上年度的增長率達到八·五%，則這個部門的領導人就不管下年度的條件變更與否，祇知維護本部門的利益，而不計其他。既然前一個化學計劃由這一條道路上失敗下來的，論理新的化學計劃不應再走這條老路，然而不然，它仍舊在這條路上受到阻撓。據黑魯說，儘管是化學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那麼重要的意義，但是在某些計劃和經濟機關工作人員的眼裏，它還是屬於第二等的事業，在編製計劃時，由於計劃機關的工作人員對於那些生產的一定部門繼續不捨，所以不能及時的抬高化學的地位。因此，黑魯曉夫說：「化學不是一種時髦」，「是麪包。是衣服，是代替五金的優美材料，是橡膠，是藥品」；「就革命的影嚮而言，現代的化學近於電，「化學的進步趨勢，其比例與意義對於國家全部經濟具有決定性的影嚮，它能造成目前所沒有的許多天然材料而有巨大效能的代用品。」因此，他斬釘截鐵的說：「毫無疑義的是，應將優先給予化學，在任何什麼上面勿予以限制，撥出更多的投資發展化學工業。」接着他又重複說：「目前七年計劃已過了五年，我們有更大的積累，所以應將優先給予化學，并且多撥投資。」

A·阿爾楚瑪年院士在「發展我國經濟的迫切問題」一文中所透露的，使我們知道反對黑魯曉夫化學計劃的，不祇是習慣上稱為

優先的那些經濟部門和計劃機關，還有經濟理論家們。

A. 阿爾楚瑪年院士認為，某些經濟理論家反對計劃工作自社會總的需要方面出發，指這種計劃工作為「消費觀點」的計劃工作，這是站不住的。他說社會需要包括各種消費，其中在現階段認為主要的是「生產消費」、「個人消費」和「軍事消費」。他指「消費」與「消費觀點」為截然兩事，不能作為一個東西去了解。「消費觀點」是表示否定積累，把生產的產品吃盡用光，這是馬克思所反對的拉薩爾派（F. Lassalle）一向被共黨稱為德意志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活動家）原則；消費，在馬克思認為是任何一個社會生產的最後目的，沒有生產即無所謂消費，亦猶沒有消費即無生產是一樣，因為在此種情況下生產是毫無目的的。因此，他質問那些經濟理論家說：「如果社會主義不為人民大眾的消費而生產，那麼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生產而生產嗎？為利潤而生產嗎？」

A. 阿爾楚瑪年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經驗再用於當前「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時期是不適當的，故而他說：在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時期，國家工業化與犧牲結合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要節約，其中也包括個人消費；現在，不但「有充分的可能順利解決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建立問題，並且還可在這個基礎上加強國防及同時加強蘇俄人民的個人消費。」

A. 阿爾楚瑪年絕對擁護黑魯曉夫的政策措施，認為後者所提在計劃中保證化學工業以及其他一些進步的工業部門與個別形式生產的優先，這在完善計劃工作及在整個經濟領導方面是新的巨大的一步。他的論據是：俄共反對教條主義的見解——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規律及其他部門的發展速度，不管加速發展工業中更有遠景的一些部門的必要性，悉按以前所形成的比例加以決定；俄共反對基本建設投資按部門按項目作數學式分配的實踐，因為這樣，新的將被人為的障礙裹足不前，而陳舊的繼續着發展下去。

他大胆的指出：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不能完全決定物質生產所形成的結構正確到何種程度及進步到何種程度。在迅速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不大進步的一些部門（如：生產舊式機器、不大經濟的燃料、原料及其他）可以達到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並且相

反的，在迅速發展更進步的一些部門，特別是以最經濟的勞動形式及最進步的機器型式供應經濟的化學，也可以達到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兩者雖然都可以保持着生產資料生產的優先發展，但是前者是保守的、落後的及低度經濟效能的生產。

他進一步更具體的指出：在開展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建設時期，有許多再生產的理論問題被提出，首先是工業中A組與B組的比例問題，直到目前為止，規定它們之間的比例，「還受着史達林錯誤教條理論殘渣的干擾」。他認為教條之一，忽視個人消費是再生產的組成部份，又是再生產加快速度的必要條件。他說，史達林認為，一貫的在人民消費品生產落後的情況下迅速發展工業生產是可能的，而指「支付能力的要求應該永遠超過生產的增長」，在原則與社會主義再生產方面就增高了消費品生產的發展不足和貨幣流通的經常過剩。所以他指史達林的教條是馬列再生產理論的叛經離道，對於經濟和人民福利有損無益。

據A. 阿爾楚瑪年在文章中透露，直到目前為止，蘇俄某些經濟學家在生產與消費的相互關係這一問題中，仍舊堅持着史達林教條的觀點，他們有意無意的將社會主義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規律同個人消費的關係分開，並且把這個法則引到荒謬絕論的地步。在許多經濟學家的見解中，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法則是目的本身，A組好像與B組無關一樣。

A. 阿爾楚瑪年強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祇是高水平生產，不祇是高度的勞動生產率，也是高水準的消費和人民福利。」因此，他說現時的生活迫切的提出一項任務——進一步使A組與B組的發展速度接近起來。他認為俄共不論在什麼時候，沒有過，也不會把生產資料生產視為目的本身，因為生產資料生產雖然是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技術水準、提高勞動生產率與減輕勞動，加強國防能力所需要的，但最後它要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并改善人民的生

活。

生產與消費分道揚鑣與另一個教條——把A 兩組發展的動態引向生產資料生產的比重在社會總產品中作簡單的數學式的增長，引向第一部類所有部門比第二部類各部門更有系統的迅速發展——結合

起來，在社會總產品中第一類類的比重究竟能變和應該增長到什麼程度呢？據A·阿爾楚瑪年指出：某些人士的邏輯它可能達到九九·九九%。

A·阿爾楚瑪年認為這些人士的邏輯是頑固的，據他個人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以高度發展第一類類為前提，以所有必需的生產資料作為社會保證，同時也以高度發展的第二類類為前提，保證人民最高的需要和福利水準。

他引現代世界發展的分析證明，在經濟中發生許多新的現象，這些新現象在社會再生產中所反映的A·B兩組的變動，根據歷史經驗所告訴我們的：可能有A組比B組更快的時期，也可能有A·B兩組平行發展的時期，或甚至於是B組更快的發展時期。

A·阿爾楚瑪年認為目前所形成的工業社會那種低結構，將來不僅可能改變，而且從理論上說是必然的；至於兩個部類之間不穩定的比例，并不表示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法則無效，因為社會應該永遠積累，沒有積累就不能再生產。為證明他的前一看法，他說，經驗表明在最近十年期間發生第一類類和第二類類的發展速度在接近，後來又造成一種可能更快的增加第二類類的產品；又為了證明他第二個看法，他同意黑魯曉夫的見解，即重工業是由兩種型式的企業所組成的：第一種企業是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二種企業是生產為輕工業、食品工業、農業、住宅建設及為人民服務的文化生活而用的生產資料。也就是說，第一類類的產品不僅是滿足這個部門本身的需要，在勞動的資料開始大規模擁向生產消費品的部門時，生產資料開始更大的為那些生產個人消費品的部門所需要。

總之，我們從黑魯曉夫本人及其代言人A·阿爾楚瑪年院士的言論與文字中，不難了解，史達林時代及黑魯曉夫執政初期的經濟比例關係，首先被認為是可以改變的；繼之，第一類類(A組)和第二類類(B組)的發展速度可以達到平衡；將來，第二類類(B組)的發展速度甚至於可以超過第一類類(A組)。

肆

黑魯曉夫加速發展化學工業、增加農業投資、修正優先發展重

工業的傳統教條，不但為習慣上稱為優先的那些部門所反對，沒有被計劃機關加以重視，遭受經濟理論家的批評，也是軍事國防當局所不能同意的。

黑魯曉夫在答復傳統上優先發展的工業部門時，用指桑罵槐的筆法，在駁斥軍事國防當局的時候，也以「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作為代罪羔羊。

軍人和太空計劃負責人如何反對黑魯曉夫的新政策措施，目前我們雖然無法洞悉其詳，但是從黑魯曉夫的言論已可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黑魯曉夫在演說的結尾部份說：關於蘇俄裁減國防支出一事，西方的理論家們紛紛揣測，這是因為蘇俄在經濟上遭遇了困難，所以被迫走上縮減軍備和裁減武裝力量途徑，因為蘇俄不可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加強國防。

他認為這都是面壁虛構的，蘇俄實行裁減若干軍事開支，并不是因為它沒有可能撥出必要的資金，「而是因為這樣做是合理的，并不影響它的強大」。他指出：「蘇俄實行縮減人人皆知的軍事支出及武裝力量的人數，并不是因為經濟上有困難，而是以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為出發點。」

他答應軍事首長和太空計劃負責人說：用理智去求得軍事支出的節約，在現時條件下，關於蘇俄的軍備和軍隊的撥款，要不減少到使西方列強有可能在軍備的力量方面超過蘇俄，并且不使它們束縛蘇俄的意志和政策。他承認假如對三軍的意義評價太低，可能要受到犧牲，不過縮減是不變的，他對軍事方面的讓步，最多不過是「不使國防受到損害」而已。

我們知道，在蘇俄的國家總預算中，國防支出的比例雖然并不很大，但是這祇是表面文章，是作給人民與自由世界看的，若是揭開暗盤，說不定會令我們大吃一驚。

我們又知道，國防支出的增減，是黑魯曉夫操縱人民和西方國家的法寶之一。俄共新綱領關於「黨在提高人民物質福利方面的任務」中說：「所擬訂定的綱領在和平的條件下是可以順利實現的，國際局勢的複雜化和由此而引起的國防費用的必要增加，可能延遲

提高人民福利計劃的實現。國際關係的正常化，軍事費用的縮減，尤其是在各國之間達成有關協定的基礎上實現全面徹底裁軍，將有可能使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計劃大大超過。——這無異告訴我們：當其國內的經濟有了問題的時候，譬如像最近一、二年的不景氣，需要誘導人民獻出更多的勞動的時候，就裁減武裝部隊，對自由世界散佈和平空氣，對國內強調物質鼓勵與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重要性；假如說他發現他的政策措施或重要計劃不能屆時實現時，爲了推卸責任，他會適時的在國際上製造風波，猶如柏林問題和U二事件等往事，宣傳增加國防支出，停止某些輕工業、食品工業、文化——生活品生產、農業、住宅建設的投資。

黑魯曉夫不但對國防支出作出爾反爾搖擺不定的姿態，他這一項實踐，我們大可用到其他方面：他對農業措施的修正，對農業與工業及工業中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比例關係的改變，都是這個時期這樣作法，另一個時期另有作法的出爾反爾搖擺不定的實踐。在他要加速發展化學工業增加農業投資的時候，他個人和他御用的一些理論家們就把個人消費的重要性說得天花亂墜，以致使西方某些專家學者以及觀察家們誤以爲黑魯曉夫在逐漸放棄共產主義的教條。黑魯曉夫每一次改變他的政策，能够說得頭頭是道，是因爲他有四個現成的道具：一個是史達林，在他對內有所更張時，就拿史達林作爲批評醜詆的對象；再一個是帝國主義，在他對外有所陰謀的時候，就拿帝國主義作爲箭垛；至於第三個和第四個道具，那就是馬克思與列寧了，他們那套可左可右的「經典」，成了他自圓其說堵住他人嘴巴的一團棉絮。

註一：阿·伊·巴拉耶夫——現任蘇俄全國穀物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曾任哈薩克共和國穀物經濟研究所所長；一九五九年曾得勞動獎章。

註二：阿·阿爾楚瑪年院士，現年六十一歲；一九二三年入黨；一九三六年畢業於紅色教授學院；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二年任阿塞爾拜疆大學校長；一九五三——五六年任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一九五六年任蘇俄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一九六二年任蘇俄科學院經濟院士部圖書記。

評黑魯曉夫最近的經濟言論

本刊三卷七期目錄

詹森總統與美國對外政策.....鄧公玄

日本國情之觀察.....孔秋泉

日本對匪政策之剖析.....朱少先

蘇俄農業的新裝.....呂律

俄共危機的發展.....關素質

共匪「文字改革」之背景及國際影響.....汪學文

反共有成的伊朗政情.....湯德衡

國際糖價與台灣糖業.....楊博清

「俄」「匪」「南」的農業制度.....尹慶耀

去年各重要工業國家金融政策.....劉國增

美蘇第三回合之爭.....羅斯陶著
張正常譯

喜馬拉雅山上的印度國防.....Piers Anderton著
武源譯

亞洲研究協會本屆年會主要論文報告.....孫德湘譯
英國工黨領袖威爾遜是怎樣一個人.....孫德湘譯

蘇俄動態述評.....一

① 俄挽救農業危機新措施。 ② 關於增加勞動力之決定。

③ 在國際貿易會議之活動。 ④ 加緊滲透葉門。

⑤ 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

蘇俄對外滲透之陣容及其活動

關素質

近數年來，蘇俄為積極加強對世界人民影響力，有計劃的誘惑亞非地區國家與蘇俄合作，以加強對新興國家之支配地位，削弱西方國家對世界影響力，乃加強對外心戰、文化合作、經濟滲透以及統戰工作。

甲 對外心戰組織及其活動

(一) 領導對外心戰之決策機構及執行機關：蘇俄對外心戰最高決策機構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十二名主席團委員中以黑魯曉夫、蘇斯洛夫、米高揚、布列日涅夫、波德哥爾尼、庫西寧等為實際領導對外心戰決策者。其執行機關在俄共中央委員會方面：書記處、思想理論委員會（主席為伊里切夫），文化部（部長為達·斯·波里卡爾波夫），宣傳鼓動部（部長為維·伊·史且巴可夫），思想部，「真理報」（總主編薩秋可夫）等。在蘇俄部長會議方面：文化部（部長為依·阿·福爾芝娃），高等及中等專科教育部（部長維·彼·葉留金），國家對外交文化聯絡委員會（主席為塞·卡·羅曼諾夫·葉留金），國家無線電與電視委員會（主席為米·阿·哈爾拉莫夫），國家電影事業委員會（主席為阿·瓦·羅曼諾夫），國家出版委員會（主席為巴·克·羅曼諾夫），新聞總署，外交部新聞局，蘇俄科學院（院長為凱爾迪什），塔斯通訊社（總社長德·普戈留諾夫），「消息報」（總主編亞·依·阿德茹佩）等。

(二) 蘇俄著名思想理論家參加對外思想宣傳工作者：○巴·恩菲道賽耶夫（P.N. Fedoseev），現年五十六歲，一九三九年入

黨，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一九三零年畢業於高爾基教育學院，一九三六年畢業於莫斯科歷史、哲學、文學研究院（紀念哲學家切爾尼謝夫斯基），一九三〇年任教授，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在俄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任蘇俄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一九四六年任蘇俄科學院通訊院士，一九六零年升院士，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任蘇俄科學院法律、經濟、哲學部門院士書記，一九六二年升為蘇俄科學院副院長，蘇匈友好協會理事長主席（從一九五八年起）：其重要著作有：「歷史唯物主義問題」，「科學的共產主義與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Humanus）。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至十四日參加在墨西哥召開之第十三次國際哲學大會，在大會上宣傳馬列主義哲學思想之優點。○尤·帕·法朗車夫，現年六十一歲，哲學家，一九二四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一九四零年入黨，曾任蘇俄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蘇俄外交部出版所所長（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年），「真理報」總主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現任俄共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資產階級社會學批判，宗教史及無神論為其專長，彼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在蘇俄科學院召開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方法論」大會上強調「以社會主義意識加強反對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並反對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愛·姆·茹可夫院士、歷史學家，現年五十七歲，一九二七年畢業於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〇年任蘇俄科學院太平洋研究所所長，一九四六年任俄共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系主任，一九五四年

至一九五七年任蘇俄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④姆·瓦·凱爾迪什院士 (Keldish M.V.) 莫斯科大學理學院畢業，爲俄著名數學及太空力學專家，一九六一年由蘇俄科學院副院長升爲院長，彼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方法論」大會上，強調鞏固唯物主義世界觀，加強反對唯心主義世界觀，並加強反宗教宣傳。⑤菲·瓦·康士坦丁諾夫，現年六十五歲，哲學家，一九一八年入黨，一九三二年畢業於紅色教授學院哲學系，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任俄共中央講師，蘇俄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德蘇戰爭時期參加蘇軍工作，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主編「哲學問題雜誌」，任俄共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任俄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長，一九五八年主編「共產黨人雜誌」，俄共第二十屆候補中委，著有「唯物主義史」，「社會意識形態學」等，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至八日率領俄代表出席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之國際社會學大會，俄共中央歷屆召開思想理論會議，彼均參加討論并提供意見。

(II) 蘇俄幾種重要理論刊物及國際問題刊物

蘇俄哲學、經濟、及國際問題之刊物，均由蘇俄科學院理論家主編，以加強批評西方思想與理論，茲列舉主編者簡歷及雜誌之背景：

①「哲學問題」雜誌，係蘇俄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刊物，現任主編爲哲學家馮·鮑·米金院士，現年六十五歲，一九一九年入黨，一九二九年畢業於紅色教授學院哲學系，俄共第十八、第十九屆大會被選爲中委，一九四三年獲史達林獎金。

②「經濟問題」雜誌，係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刊物，現任主編爲經濟學家拉·姆·加托夫斯基，現年六十一歲，一九三五年畢業於蒲列汗諾夫國民經濟學院，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曾在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任共產主義經濟研究院經濟系主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蘇俄中央統計局主任，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任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參加蘇軍工作，從一九五七年起主編該雜誌。

③「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係國際共產黨刊物，現任主

編爲經濟學家阿·姆·魯米揚采夫 (A.M. Rumyantsev)，現年五九歲，一九二六年畢業於烏克蘭哈爾科夫國民經濟學院，一九四零年入黨，一九三零至一九四三年任研究及教授工作，烏克蘭科學院社會科學部主任，及經濟研究所所長，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任俄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主編「共產黨人」雜誌，一九五八年起主編「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

④「共產黨人」雜誌，屬於俄共中央宣傳鼓動部之黨的理论刊物，現任主編爲瓦·巴·斯且巴諾夫 (V.P. Stepanov) 一九二六年入黨，一九三五年畢業於莫斯科歷史哲學文學研究院，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蘇俄人民委員會無線電化及無線電廣播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在俄共中央機關工作，嗣任國家出版局總主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主編「文化與生活」雜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任「真理報」副總主編，從一九六二年起主編「共產黨人」雜誌。

⑤「今日亞洲與非洲」雜誌 (Asia and Africa Today) 屬於蘇俄科學院非洲研究所及蘇俄科學院亞洲人民研究所之刊物，現由蘇俄東方學家布·格·加富洛夫任總主編，彼現年五十六歲，一九五八年蘇俄科學院院士，一九三二年入黨，一九二八年畢業於沙馬爾干法律學校，一九三一年畢業於莫斯科全俄新聞學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任塔吉克中央書記 (主管宣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任塔吉克黨中央第一、第二書記，從一九五六年任蘇俄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所長，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率領蘇俄代表團參加第六屆亞非人民團結會議。

⑥「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雜誌，屬於蘇俄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之研究刊物，總主編爲雅·斯·哈維松院士，副總主編爲愛·斯·瓦爾加院士 (世界經濟學權威)，尤·克·阿斯托洛維雅諾夫院士，阿·阿·阿爾蘇馬揚院士，現年六十歲，一九二三年入黨，一九三六年畢業於紅色教授學院，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二年任阿賽爾拜疆大學副校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任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一九五六年任蘇俄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

關係研究所長，一九六二年任蘇俄科學院經濟部門院士書記，著有「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價值論」。

(四) 心戰工具與對外交化滲透

◎社會科學書籍：一九六二年蘇俄出版社會科學書籍與小冊，以九十三種文字發行，六十一種屬於蘇俄國內各民族之文字，三十二種屬於外國文字，共出版一二四八八四二千冊，有一〇九種屬於翻譯各民族及各國文字之書籍，其中有六十種屬於蘇俄國內各民族文字翻譯之書籍，有四九種屬於外國文字翻譯之書籍，馬列主義著作有一六九種，共發行四四〇八千冊，屬於列寧主義著作出版一三〇版次，三三三三三冊，屬於馬恩著作三九版次，一二七三千冊，政治社會經濟著作，一一一〇〇種，共出版二二八九六八千冊（十五個共和國出版書籍未算在內）。一九六二年出版書籍，比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六點九種，冊數增加百分之二一點六。

◎雜誌：一九六二年出版九七九種，一九六一年出版九五〇種，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二九種。

◎報紙：一九六二年蘇俄共出版四七七一種報紙（十五個共和國出版之報紙未算在內），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一〇五五三九四千份，以六十三種文字（五十六種屬於蘇俄國內各民族文字，七種是外國文）「真理報」一九六二年共發行六億份，「消息報」共發行五億份，「蘇維埃俄羅斯報」共發行二億份。

◎對外文化合作協定：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九月非洲地區僅有迦納（一個文化協定），幾內亞（三個文化協定）及衣索比亞（一個文化協定）三個國家與俄帝簽訂文化協定。迄一九六二年增到十個國家：衣索比亞（一個）、迦納（三個）、幾內亞（六個）、達荷美（一個）、喀麥隆（一個）、馬利（五個）、奈及利亞（一個）、塞內加爾（三個）、索馬利亞（三個）、蘇丹（二個）（見一九六三年蘇俄外交部出版「蘇俄與非洲」一書）。一九六一年俄與英、義大利、挪威、冰島、日本、印尼、阿富汗、伊拉克、尼泊爾等九個國家簽訂文化協定。一九六二年俄與印尼、挪威、義大利、敘利亞、丹麥、印度、阿富汗、土耳其、美國等九個國家簽訂文化協定。從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六五年俄對非洲國家文化

滲透已加強。

乙 對亞非地區之經濟滲透

蘇俄對亞非地區經濟滲透工作之決策機構，為俄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其執行機構，主要有三：◎蘇俄部長會議國家對外經濟聯繫委員會，主席為斯·阿·斯卡柯夫（S. A. Skachkov）。◎蘇俄部長會議對外貿易部，部長為恩·斯·帕托里切夫（N. S. Patolichev）。◎蘇俄部長會議常設委員會對外經濟問題委員會（註一），主席為姆·阿·李賽契柯（M. A. Lesechko）。重要領導者為黑魯曉夫、米高揚、及柯西金（現任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四日蘇俄部長會議國家對外經濟聯繫委員會主席斯·阿·斯卡柯夫答覆俄共「真理報」記者稱：「現蘇俄協助亞非十四個國家經濟建設與工業企業建設在三百個項目以上，信用貸款九十億盧布。」蘇俄在亞洲着重對印尼與印度之經援。茲列舉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俄與印尼簽訂之經濟協定如下：一九六一年與印尼簽訂四個經濟協定（一月六日、六月十日、八月十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二日蘇卡諾訪俄，與俄發表聯合公報；印尼參謀總長二度訪俄（一月六日、六月十日）。一九六二年與印尼簽訂二個經濟協定（四月簽訂協助印尼建設冶金廠、鋁廠、酸性磷酸鹽廠各一之協定，五月三十日簽訂經濟協定）；五月三日至九日印尼總理蘇班達里率政府代表團訪俄；七月間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訪印尼。俄與印度簽訂之經濟協定：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四日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柯西金訪印度，簽訂經濟協定；俄貸予印度一二點五億盧布作為建設印度工業與企業之需要；三月三日與印度在德里簽訂建築完成白黑拉伊冶金工廠之協定，九月六日至十一日尼赫魯訪俄，十月六日俄與印度簽訂和平使用原子能協定，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列涅夫訪印度。一九六二年蘇俄為增加印度白黑拉伊冶金工廠出產，每年供給一億至二億五千萬噸冶金原料，并協助印度建設煉油廠，每年由俄供應二億噸石油。三月簽訂建設醫療器材工業一所之協

定，五月簽訂蘇俄技術專家協助印度建設電力工業之協定，六月簽訂建設綜合化學藥劑廠一所之協定，九月簽訂在印度巴托拉都建設一所大的熱電站中心，及供應大量石油產品之協定。

從一九六三年蘇俄外交部出版之「蘇俄與非洲國家」一書（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俄對非洲外交活動文件，由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蘇俄科學院院士非洲專家維·姆·黑伏斯托夫及蘇俄科學院非洲研究所研究員愛·阿·維賽爾根，爾·伊·吉姆等合編），可看出俄對非洲經濟滲透之積極。茲列舉蘇俄與非洲新興國家經濟合作、商務關係及政治關係等情形如下：

(一) 經濟與科學技術合作：
 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九月，俄與迦納（簽訂二個協定）、幾內亞（簽訂六個協定）、蘇丹（簽訂一個協定）、衣索比亞（簽訂四個協定）等四個國家簽訂經濟協定。從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六二年增到十一個國家：迦納（八個協定）、幾內亞（七個協定）、蘇丹（四個協定）、喀麥隆（一個協定）、馬利（五個協定）、奈及利亞（一個協定）、阿聯（二個協定）、塞內加爾（二個協定）、索馬利亞（四個協定）、突尼西亞（一個協定）、衣索比亞（二個協定）。

(二) 商務關係：
 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九月俄與迦納（三個協定）、幾內亞（四個協定）、埃及（一個協定）、摩洛哥（一個協定）、蘇丹（一個協定）、衣索比亞（二個協定）等七個國家共簽訂十五個商務協定。從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六二年共增列十五個國家：迦納（五個協定）、幾內亞（三個協定）、達荷美（一個協定）、喀麥隆（一個協定）、馬利（六個協定）、摩洛哥（二個協定）、奈及利亞（一個協定）、尼日爾（一個協定）、阿聯（二個協定）、塞內加爾（三個協定）、索馬利亞（三個協定）、蘇丹（四個協定）、多哥（二個協定）、突尼西亞（二個協定）、衣索比亞（一個協定），共簽訂三十五個商務協定。

(三) 政治關係（包括外交活動、政府首長訪問等）：
 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九月俄與象牙海岸、上伏塔、加

蘇俄對外滲透之陣容及其活動

彭、迦納、幾內亞、達荷美、埃及、喀麥隆、剛果（布拉薩維爾）、剛果（利奧波爾德維爾）、利比里亞、利比亞、摩洛哥、尼日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馬利、中非共和國、查德、衣索比亞等二十二個國家發生政治關係。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六二年增列到三十二個國家：阿爾及利亞、象牙海岸、蒲隆迪、上伏塔、加彭、迦納、幾內亞、達荷美、喀麥隆、剛果（布拉薩維爾）、剛果（利奧波爾德維爾）、利比里亞、利比亞、茅里塔尼亞、馬利、馬拉加西、摩洛哥、尼日利亞、尼日爾、阿聯、盧安達、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獅子山國、坦噶尼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中非共和國、查德、衣索比亞。其中以迦納、幾內亞、剛果、馬利等國家與俄政治關係較為密切。

蘇俄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雜誌（一九六四年三卷）所載「蘇俄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之經濟聯繫」一文所列二表，足已說明俄對亞非地區經濟滲透之加強。

表一 蘇俄與亞非國家商品交易額（以億盧布為單位）

洲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亞洲	五二	一三三	一三五	三〇九	四九九	四〇七	四二八	五六二	六三六	
非洲	二	四〇	九二	二〇五	一八九	二三五	二五八	二九九	二五五	

表二 蘇俄輸出亞非國家之機器及設備（以億盧布為單位）

洲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阿富汗	二·六	四·七	七·八	一〇·一	一四·四	一八·四	二二·一	二〇·三	
迦納						三·四	一一·一	三·八	
幾內亞				〇·〇三	一·一	二〇·一	八·六		
印度	〇·三	六·三	四·六	九·七	三三·九	二二·七	四八·五	六九·九	
印尼		〇	四·九	一三·一	三三·〇	八·九	一九·一	四二·〇	
伊朗	〇·六	一·二	三·四	一·六	一·九	二·一	一·六	〇·九	

伊拉克									
馬利									
阿聯	0.0	4.4	3.6	3.4	1.9	1.0	3.9	6.7	5.3
敘利亞	0.0	0.2	1.9	7.3	4.0	2.6	8.6	2.3	
土耳其	0.1	0.8	1.2	3.1	3.6	4.8	2.3	1.4	

丙 統戰組織及活動

蘇俄執行對外統戰業務之機關：在俄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之下設有國際聯絡部，國外共黨部，外事部（部長為前俄駐中華民國大使潘友新）。在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之下，設有國際聯絡部（現任部長為維·格·維多金）；蘇俄議會代表團會議（見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蘇俄最高蘇維埃第十七號公報，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蘇俄最高蘇維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組成「蘇俄議會代表團會議」），主席為現任蘇俄聯邦院主席伊·瓦·斯皮里多諾夫（Spiridonov I. V.），曾任列寧格勒省黨部書記及市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俄共中央書記（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俄共第二十二屆中委、副主席二人，其一為現任蘇俄民族院主席雅·瓦·貝伊維（Ya. V. Peive 曾任拉托維亞科學院主席，及拉托維亞部長會議主席，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其二為蘇俄民族院副主席伊·阿·卡伊洛夫（I. A. Kairov 曾任俄羅斯教育學院正副院長，俄羅斯共和國教育部部長，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書記是托·恩·尼科拉也娃（T. N. Nikolaeva 伊凡諾夫教育學院畢業，曾任伊凡諾夫市黨部宣傳部主管，一九五九年任伊凡諾夫市黨部第一書記，同年三月任全俄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委員三十一名（國立莫斯科大學校長彼得洛夫斯基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蘇俄議會代表團會議之代表團，由尤·伊·巴立茲斯基（U. I. Palevskis 現任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俄共第二十二屆候補中委）率領訪義大利議會；十

月二十日蘇俄議會代表團由伊·瓦·斯皮里多諾夫率領訪巴西議會；十二月三日至十三日蘇俄科學院副院長，蘇俄民族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彼·尼·菲道賽也夫（P. N. Fedoseev）率領蘇俄議會代表團訪英。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黑魯曉夫接見索馬利亞議會代表團。六月二十三日突尼西亞議會代表團訪蘇俄最高蘇維埃聯邦院主席斯皮里多諾夫及民族院主席貝伊維，蘇方介紹蘇俄選舉制度及最高蘇維埃活動等予突尼西亞議會代表團，十月四日俄駐土耳其大使雷若夫將土耳其議會代表團訪俄時所攝之彩色記錄影片一套，送交土耳其議會議長與爾巨傑呂。

俄共執行對外統戰活動的外圍組織甚多，現將其活動較為積極者列舉如下：

(一) 亞非國家團結委員會蘇俄委員會：一九五六年成立，主席為米爾邵·圖爾森——札杰，設下列四個組織：① 亞洲與阿拉伯國家委員會，② 非洲國家委員會，③ 新聞委員會，④ 國際聯絡委員會。從一九六一年起該會在外高加索亞美尼亞、阿賽爾拜疆、格魯吉亞三共和國及中亞細亞五共和國均成立分會。一九五八年以來，該會訂出亞非國家各種「日」以號召爭取民族獨立的反帝鬥爭，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非洲人民會議決定每年四月十五日為「非洲自由日」（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俄共「真理報」社論稱，非洲二億六千七百萬人口中，二億一千八百萬已獲自由，尚有四千九百萬尚受殖民主義壓迫）。一九六一年該會邀請亞非國家代表，於六月訪問北韓，七月訪問北越，十一月訪問印度，并參加亞非人民團結非常大會（一九六二年一月在開羅舉行）。

一九六一年該會撥出亞非人民團結基金二千萬美金，各種物資約合一億盧布，十名獎學金贈予蘇俄大學中之亞非學生。一九六二年該會邀請亞非國家

問題與研究

第二卷合訂本

本刊為服務讀者，特將第二卷十二期精裝合訂本，塑膠面燙金，的收成本費每本六十元，需要讀者請逕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本社洽購。

代表訪問摩洛哥及阿爾及利亞，八月參加在日本召開第八屆禁止原子武器國際會議，九月在幾內亞科納克里召開基金會會議，十月在可倫坡召開亞洲國家經濟合作會議，一九六二年基金會撥出二億盧布為阿爾及利亞難民之糧食及藥品之需要，并撥出給予在蘇俄大學之亞非國家學生六十名獎學金。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至十日亞非人民團結第三屆大會在坦噶尼喀之莫希舉行，俄方由米爾邵·圖爾森——札杰率領代表團參加。同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日在賽浦勒斯首都尼可西亞召開亞非人民團結執行委員會，俄方由米爾邵·圖爾森——札杰率領代表團參加。

(一)蘇俄與各國文化友好協會，於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由各國三九個文化社團聯合組成，在蘇俄各共和國各大城市均設有分會，該會主席團主席為恩·瓦·波波娃(註二)，該會迄一九六二年止在全世界各國共設有一二二個科學與文化機構，一九六二年該會曾在三三三個國家舉行關於蘇俄文化、藝術、電影、攝影等八十二個展覽會，該協會出版物為「文化與生活」雜誌，以俄、法、英、德、西班牙等國文字出版，報紙為「莫斯科新聞」以英、法、西班牙等國文字出版。

(二)蘇俄青年組織協會：一九五六年成立，主席團主席為帕·恩·雷夏托夫，該協會由世界民主青年聯盟、蘇俄大學生會、國際大學生會等聯合組成，該協會在全世界一〇一個國家已有一千個以上青年組織，一九六二年共有五六〇個青年代表團到蘇俄訪問，蘇俄青年共有五〇〇個代表團參加訪問國外青年組織，一九六二年七月蘇俄青年組織協會曾在俄成立國際工人野營，共有二五個國家青年工人前往參加。

(四)蘇俄婦女協會：一九四一年成立，主席團主席為恩·瓦·波波娃，一九六二年有二五個國家三四個外國婦女代表團到蘇俄訪問，蘇俄有二四個婦女代表團出國赴二十個國家訪問，蘇俄婦女協會與八十個國家婦女團體有聯繫，出版刊物「蘇俄婦女」，除俄文外，并用九種外文發行。

蘇俄對外滲透之陣容及其活動

結論

(一)蘇俄對外心戰組織及其活動，在軍事機構與宣傳工具方面均積極加強與擴大，表示今後蘇俄對冷戰將繼續增強。

(二)蘇俄經濟滲透，在亞洲着重印度與印尼，在非洲着重迦納、幾內亞、剛果、阿聯等地區。在人事方面俄共運用蘇俄中亞細亞五個共和國及外高加索三個共和國民族之特點，担負亞非地區國家統戰活動之任務。

(三)蘇俄科學院研究機構與院士，以學術與科學機構名義對外加強活動，如非洲研究所、亞洲人民研究所、東方學研究所，均已成為蘇俄侵略亞非國家之工具。

註一：據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外電稱，從經濟互助委員會內已設立一對外經濟援助之機構，因而「蘇俄部長會議常設委員會對外經濟問題委員會」已於一九六三年撤銷。

註二：恩·瓦·波波娃(女)，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曾在格爾稱研究所學習一年，一九三二年入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契爾尼謝夫斯基歷史哲學文學研究所畢業，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任黨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任全俄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一九四七年任蘇俄婦女協會主席，及國際民主婦女聯盟主席，一九五三年獲國際列寧和平獎金，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候補中委，俄共第二十二屆升為中委。

本刊廣告刊例

種類	甲種	乙種	丙種	丁種	戊種
面積	封底半頁	封底裏全頁	內文全頁	內文半頁	內文上4頁
價格	叁仟元	叁仟元	貳仟元	壹仟元	陸百元

明初的對日外交

余又蓀

壹 明太祖與征西府之通交

洪武元年（日本南朝長慶天皇正平二十三年，西紀一三六八年）正月，明太祖稱帝，八月元順帝退出中原，十一月太祖遣使至日本。安南·占城·高麗四國，致送國書，告知明已滅元，新建國家。蓋新君登極，詔諭四夷之意。

所遣使節姓名不詳。太祖頒賜日本諸國之詔曰：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遐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遐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見皇朝資治通紀卷二，皇明從信錄卷四）

當時九州爲南朝所據，設鎮西府，懷良親王任征西府將軍。明使至征西府，懷良親王以從未聞有「明國」，且來書對日本用「爾四夷君長酋帥」等倨傲辭語，遂不受其國書，拒明使。當然懷良親王或南朝天皇不致遣使入明。明史卷二太祖本紀洪武二年記云：「是歲，占城，安南，高麗入貢」。元年賜詔日本等四國，二年占城

等三國貢使來，獨日本拒而未來。此爲太祖第一次遣使至日本。

太祖以元年遣使告諭日本，既屬徒勞，而沿海倭寇之患又熾。明史太祖本紀云：「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東濱海郡縣」。太祖乃於二年（西紀一三六九年）三月，又遣楊載爲使，往諭日本。明史卷三二日本傳謂其國書有云：「倘必爲寇盜，即命將徂征耳」。太祖實錄卷三九以及籌海圖編卷二，記其詔諭云：

「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得據之，播故俗以腥羶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按指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辛卯歲，西紀三五一年，是歲紅巾賊起，徐壽輝叛元稱帝）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國之舊家，恥前王之辱，與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報。聞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備兵自固，永安國土，以應天休。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至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仁哉？惟王圖之！」

楊載等一行七人抵太宰府，懷良親王覽其書，怒殺明使人五人，拘留楊載吳文華二人三個月後始釋放回國。（修史爲徵一大明皇帝書）。

太祖第二次遣使至日，仍無結果，而沿海倭寇之患益烈。明史日本傳云：

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且詰以入寇之故。謂

宜朝則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爲寇，即將命將徂征耳。王其圖之！日本王良懷不奉命，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縣。」

當時明廷對日本國情，並不十分明瞭，據明史所載，明廷誤認當時在九州征西府之南朝鎮將懷良親王爲日本國王，而又將「懷良」誤爲「良懷」。

太祖苦於沿海倭寇之患，而又不敢對日本用兵，雖兩次遣使，均受日本南朝鎮將之侮辱，但仍委屈求全，仍謀循外交途徑以解決倭寇問題。洪武三年（日本建德五年，西紀一三七〇年）三月，太祖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前往宣諭。是爲明使至日本之第三次。

修史爲徵大明皇帝書中謂太祖責倭寇入侵之事云：「恐積惡貫盈，天必降禍於汝！我國家必奉天討，用與問罪之師。」

此次太祖賜日本之詔書，與洪武二年之詔，大意相同，對日本詰責威嚇備至。皇明馭倭錄一，載此詔云：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主中國，汗懷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目神效靈，諸將用命，救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宗，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特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蕃，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趙秩到了征西府和懷良親王交涉。懷良初尙念對元之舊仇，蓋元世祖一面派趙良弼爲使通好，而一面派大軍前往征討。懷良又疑趙秩爲良弼之裔，且有殺之之心。幸趙秩長於綏遠之才，與懷良辯

解，懷良爲其說服，終對趙秩禮遇甚優，且派僧祖來入明通好。明太祖通好日本之計劃，得到初步的成功。

明史日本傳記其事云：

「洪武三年三月，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書有責其不臣語。良懷曰：『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使其臣趙姓者誅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軍盡覆。今新天子帝中夏，使亦趙姓。邀蒙古裔耶？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也？』目左右，將兵之！秩不爲動，徐曰：『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能兵，兵我！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

這段文字描述趙秩與懷良親王之應對，很爲生動。

當趙秩赴日不久，明廷又命曾使日本之楊載，將沿海捕獲之海賊僧侶等十五人送還，以示德政。此爲明使第四次赴日。修史爲徵一大明皇帝書記楊載所致詔諭有云：

「所獲之人，情犯深重，揆諸法律，罪在不宥，緣係日本所部，故不欲便加殺戮；如不施之以刑，又無以示其懲戒，是用刑其肢體，遣人送還。」

楊載送俘還日本，促進了趙秩外交的成功。

明初苦於倭寇之患，太祖決定了通好日本，希望他自行禁止倭寇，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但明廷不明日本的國情，把交涉的對象弄錯了，以爲九州征西府的征西將軍懷良親王便是日本的國王。這一錯誤尙不重大，後來太祖明瞭日本國情後，便欲直接通好日本的「持明」天皇，並不妨礙太祖的外交政策。

但明廷始終認爲倭寇是日本國王或政府派遣前來做寇盜的，始終以此詰責日本國王，遂致引起反感。不僅懷良親王因此對明發生反感，就是後來足利義滿將軍親明之後，明廷仍認倭寇是日本政府派來作盜的，因而促成義滿之子義持之對明絕交。義持對此的答辯

很明白而且憤慨。他說：「……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今倘云止之，則前知而令之也。豈有人主而教民爲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甚至對明送還所捕倭寇，亦表示憤慨，義持說：「至夫寇掠邊圉，則遁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者之所爲也。欲討，電滅颯逝；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而來哉？」

明代中日交涉發生許多波折，是從這種誤會而來的。

木宮泰彥之中日交通史謂：「征西府屢次拒絕明使，實因未明中國情形，且見其國書常有威嚇之辭，疑其爲第二蒙古也。及趙秩來日，乃明瞭明朝之事，故親王遣僧祖來使明。」

其實當時日本南北朝對峙，戰亂頻仍，國困民窮，南朝尤困，懷良等人知宋元中日貿易之利，亦欲與明通好而圖利也。

洪武四年（日本長應天皇建德二年，西紀一三七一）十月，懷良親王所派遣的僧如來到南京，太祖當然高興，厚待之。但祖來此來，不過爲懷良親王所派之親善使節而已，並未負有其他使命。是爲日使入明之第一次。明史日本傳云：

「……三年……懷良……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今浙江寧波及臨海縣）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四年亦記云：

「冬，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並僧九人來朝。」

此外太祖實錄，籌海圖編及明書等均載有此事；不過明書以入貢在八月，明史日本傳及明史記事本末則謂在十月。祖來之使明，當屬確實。送還明州台州之人七十餘人者，所以答楊載送還日本海賊僧侶等十五人之意也。日人謂懷良親王對中國向執自主的態度，未必有「奉表稱臣」之事；或起草僧侶，作如是形式？抑或撰明史者潤色之詞？

貳 太祖與日本幕府之通交

明初倭寇之患，年年發生：明史太祖本紀記洪武三年六月，倭寇山東、浙江、福建濱海郡縣；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倭寇膠州。明史日本傳記四年倭掠溫州。明書記四年八月倭寇福建。通鑑明紀記四年六月，倭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濱海州縣。

太祖苦於倭寇，遣使通明，當必求知日本國情。當時日本之留學僧椿庭海壽在金陵，太祖嘗召問之。第一次日使僧祖來到金陵，太祖當然必垂詢日本國情。

本朝高僧傳之僧椿庭海壽傳，謂日僧椿庭海壽，入華已久，掛錫於金陵天界寺自菴金處。太祖嘗召見於奉天殿，詢日本四方之遐邇，皇運之治亂。蓋太祖苦於倭寇之患，欲通好日本，因而急欲知日本國情也。太祖從這些僧侶處，得知（一）其俗佞佛，（二）當時日本國內分裂，正在和明朝交涉的懷良親王，並非日本國王；親王之外，京都尚有「持明天皇」。

太祖知道以前幾度交涉，都找錯了對象。太祖於是改變了方針，不以與懷良親王交涉爲滿足，想和「持明天皇」直接交涉。

其實當時太祖對日本之國情，猶未完全明瞭。雖知懷良親王之上有向天皇，但所謂「持明天皇」云云，則尚未將南北朝對峙，室町幕府與南北朝之關係，以及日本天皇世系等明瞭也。懷良親王爲何如人，亦未明瞭，故明史日本傳有「時懷良年少，有持明者與之爭立」之誤。

洪武時代，北朝之持明院統有後光嚴、後圓融兩代天皇；南朝之大覺寺統有長慶及後龜山兩代天皇。懷良親王爲後醍醐天皇之子，屬於南朝。懷良據九州征西府，與京都北朝之後光嚴天皇及室町幕府對峙者也。

洪武四年，當僧祖來歸日本時，太祖特遣嘉興府天寧禪寺住持仲猷祖闡，金陵瓦官寺住持無逸克勤二人送之歸；又遣椿庭海壽與杭州中竺藏主權中巽二人爲通事。表面上是爲答聘懷良親王；而太祖本意，則特派此二僧前往通「持明天皇」也。太祖告祖闡克勤二人之語，見於瓦官（克勤）致日本天台座主書中，載於善隣國實記卷上。

茲據諸書，將祖闡及克勤等使日之旅程，述之於左。

一、克勤等於洪武四年十月祖來，到金陵之後，奉太祖命出使日本（明史日本傳）。

二、他們於洪武六年（南朝長慶天皇文中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應安六年，西紀一三七三年）五月二十日發自明州（即元之慶元，今之寧波），經五月而達肥前之五島，又五日而抵博多（善隣國寶記卷上，慶安六年，大明洪武六年，瓦官寄天台座主書）。

三、是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京都，入嵯峨之向陽院，滯留京都，凡二閱月。至是年八月二十九日退去（阿蘇文書）。祖闡既至京都，入嵯峨之向陽院，聚徒演法，人頗敬信，滯留凡二閱月（花營三代記）。（明史日本傳亦謂祖闡等既至，爲其國演教，其國人頗敬之）。

上面說過，據九州征西府之懷良親王，屬南朝，他何以讓祖闡等明使越過九州而到京都去？當祖闡等抵九州之博多時，適值懷良親王博多移住於肥後之菊池，而由九州之武家今川了俊爲鎮西探題，對明使之注意稍弛，且彼等爲僧侶，又以日本留學僧椿庭海壽等爲通事，故此時征西府未加阻難即讓他們入京都。此乃北朝朝廷及足利幕府與明交涉之始。但其交涉內容，無可考證。

四、祖闡等離京西歸途中，又至征西府聘問，上大統曆及文綺紗羅。是時南朝和北朝正在九州一帶作戰，懷良親王以彼等祕密入京，怕明使通北朝後，影響自己獨佔對明的貿易，又怕北朝得到明朝物質上之資助，在當時戰爭的局勢上，於自己不利；又憤其願示大統曆，有使奉正朔之意，拘留二僧甚久，至洪武七年五月，始得返金陵。

空華日工集謂克勤長於詩文，在日時，五山僧徒與之往來，會託刪改詩文，並請作詩軸之序。克勤見義堂周信詩文，極口稱讚。

明史日本傳記祖闡等赴日本之經過云：
「洪武四年十月（祖來）至京，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也。乃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還國。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六年……祖闡等既至，爲

明初的對日外交

其國演教，其國人頗敬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還京。」

善隣國寶記卷上，應安六年，（大明洪武六年），瓦官（瓦官教寺主持無逸克勤）寄天台座主書曰：

「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驅羣胡而出境，復前宋之故土，中原既平，邊境亦靖，時則游神內典，思欲振之，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下三宗碩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于京之蔣山寺，帝自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率文武百官，詣壇設拜。又勅制樂章，命樂師，奏以獻佛，衆見瑞光燭天，夜雨五色之物，戒若珠璣。時帝大悅。天界白庵禪師以吾宗耆宿，而數召對經論稱旨。迺奏復瓦官爲天召教寺，衆即推動主之。蓋前兩年，皇帝凡三命使於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于時以祖來入朝稱賀。帝召天寧禪寺住持祖闡，瓦官教寺住持克勤，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指良懷遣僧祖來使明，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更主，建號大明，建元洪武，嚮以詔來，故悉阻於關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數冠我疆，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又命曰：『朕聞其居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來，無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即賜之三衣，與十八淨物之切於用者。又恐至彼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海壽公，中竺藏主權異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勤謂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于佛教而欲犯佛之戒，勤雖死弗爲也。今皇帝既以我爲可信而遣之，則是我持不妄戒也。勸人禁冠，不盜戒也。修兩國之好。使商賈交通，民決其生，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之戒，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承命之日，以此而不辭』，云云。五月廿日，命舟四明，三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

善隣國寶記作者附註云：
「右大明天寧寺住持仲猷，諱祖闡，瓦教官寺長老無逸，諱克

勤，奉使來，久寓筑紫，因死官寄日本天台座主書中所述如是。先是三度遣使齎詔書來，然關西不通之，故命无官天寧雨長老直告來意耳。太祖嘗眷於日本可觀也。

上文所述太祖諭祖闡克勤之語，望日本國王禁倭寇，通商賈，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是太祖對日本外交政策的三個基本重點。太祖雖努力通倭，而兩國關係，迄無進展，歷年沿海倭寇之患甚烈。

（明史日本傳：洪武五年倭寇海鹽，澈浦，又寇福建海上諸郡

明書：洪武六年七月倭寇沿海，逐走之；八月，命造海船禦倭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六年三月，甲子，指揮使於顯爲總兵官備倭。

通鑑明紀：洪武六年八月，倭寇福寧（福建霞浦），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之，中流矢卒；福州衛指揮同知張赫追寇至琉球大洋，與戰，擒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弓刀器械無算。

明史日本傳：洪武六年倭寇萊登。

明史廖永忠傳：洪武六年，德慶侯廖永忠督舟師出海捕倭，又上書太祖請造船備倭。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七年，春正月，靖海侯吳禎爲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巡海捕倭。七月壬申，倭寇登萊。

自洪武七月以還，倭使亦屢次來華，但並非兩國正式外交，明史日本傳云：

「洪武七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宜聞溪等齎書上中書省，貢馬及方物，而無表。帝命卻之，仍賜其使者遣還。」

所謂「其大臣」者，即奉戴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之菊池武政也。明書載是年六月，日本及西域諸國入貢，殆指同一事也。

明史日本傳又云：

「未幾，其別島守臣氏久，遣僧奉表來貢。帝以無國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卻之，簡賜其使者。命禮臣移牒責以越分私貢

之非；又以頻入倭掠，命中書省移牒責之。」所謂「別島守臣」者，即當時大隅守護之島津氏久也。所謂「未幾」，不知指何年。明史太祖本紀記洪武八年日本入貢，殆指此事。

日本國志記：

「天授元年，大內氏久亦遣僧上表，太祖以無國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賜其使者，命禮官移牒，責以越分私貢之非；又以頻入寇掠，命中書省移牒責之。」

按日本天授元年，當明洪武八年。所載大內氏久遣僧之事，與明史日本傳所載別島守臣氏久遣僧之事相同。似係同一事而所記遣僧入明之人名有出入。所遣之僧，或即爲僧如瑤。

日本國志又記：

「天授元年，征夷將軍源義滿（即足利義滿）遣僧中津妙佐於明。」

明史日本傳未載洪武八年義滿遣使之事。

按上述僧祖闡等赴日本，及日本使節來明之事，因正值日本南北朝在九州方面混戰之際。（明史日本傳謂良懷以年少，有持明者，與之爭立，國內亂）。故當時明使在日本之經過，以及日本派使節入明者爲何人，頗不易明瞭。從來學者，說法不一。

上述祖闡等赴日本，先潛入京都，歸途至九州，爲征西府將軍懷良親王所拘留，此說見宋濂翰苑續集，及木宮泰彥之中日交通史。

又一說，明朝使者祖闡等先至九州時，因其欲潛赴京都之北朝，即爲懷良親王所拘留，及北朝將筑紫之征西府佔領，又疑祖闡等與懷良親王有關係，仍未釋放。及將祖闡等被拘緣由查明，始釋出而令其入京都（征夷將軍足利義滿召之入京）。計拘留達二年之久。祖闡等在京都滯留未幾，即於洪武七年五月回到南京。日本國志如此記述。黎光明之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亦作此結論。持此說者認爲北朝對明之外交一時甚爲積極；蓋當時北朝

因連年征戰，財政奇窘，亦盼與明通商，以解決財政上之困難。故與明使祖闡會談之後，即應允禁倭寇，及遣使入明，並送還所擄明朝及高麗民百五十人。明史日本傳所記「洪武七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宣聞溪入明」之事，爲北朝所遣之使，並非地方武人菊池武政所派遣；「其大臣」殆爲北朝之大臣，或即室町幕府之將軍也。因此，宣聞溪之來，爲北朝第一次之遣明使。如此說來，則所謂洪武八年（天授元年）征夷將軍源義滿遣僧中津妙佐入明之事，亦似有可能。但就當時日本國情觀之，北朝遣使實不可信。北朝雖一度佔領九州之西征府，未幾南朝在九州之戰事又獲勝利，北朝通明之道路爲南朝之征西府所阻塞，明與北朝及幕府之交通迄未完成。室町幕府將軍源義滿遣使入明之事不可謂。日本史籍並無洪武初年義滿遣使之記載。

叁 太祖與征西府通交之斷絕

洪武九年（日本南朝長慶天皇天授二年，西紀一三七六年），日本又遣僧圭廷用入明，明史日本傳云：

「乃以九年四月遣僧圭廷用等來貢，且謝罪。帝惡其表詞不誠，降詔戒諭，宴賚使者如制。」

日本傳記此事，緊接上文「別島守臣氏久遣僧來，禮臣責其越分私貢，中書省移牒責其入寇」，意謂僧圭廷用之來，乃因受責而來謝罪者。實則兩使之來，似無連帶關係。

圭廷用，圖書編之日本國考，皇明從信錄，及籌海圖編作歸廷用或歸庭用。日本國志作圭庭用。本朝高僧傳有延用文珪傳，當作延用文珪爲是。

文珪傳謂文珪使明，爲懷良親王所派遣，其目的不明。洪武九年四月到金陵，贈書及方物等。太祖惡其書詞缺乏誠意，降詔戒諭。文珪在明時，曾請翰林學士宋景濂爲其寶福寺撰寺記，勒之堅珉。

圖書編卷五十日本國考記此事云：

「國朝洪武……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

文珪所上之表，未傳於今日。太祖「降詔戒諭」，此詔文，殆即高祖皇帝御製文集中之「諭日本國王詔」，其文曰：

「洪武九年太祖諭日本國王詔書
曩宋失馭，中土受殊，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有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援隣邦。前年，浮海入貢，朕以夷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不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明史太祖本紀謂洪武十二年（南朝長慶天皇天授五年，西紀一三七九年），日本入貢。明史日本傳亦謂「十二年來貢」。明書謂是年日本來貢，又無表文，乃安置使僧於陝西番寺。圖書編及皇明法傳錄謂是年來貢，舐，無表，却之；來人分發川、陝三邊安插。使者之姓名失傳，亦不知爲誰所遣。此後日本使者常至中國，諸書記載不一。高皇帝御製文集，謂貪商假名之徒不少。

明史日本傳云：

「洪武十三年，復貢，無表，但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丞相書。書辭又倨，乃却其貢。遣使齎詔譴讓。」

明書以日本入貢，在是年九月；遣使往諭日本，則在是年十二月。日本國志且謂丞相爲胡惟庸。按惟庸已於是年正月伏誅，日本或未之聞也。

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謂是年「義滿是否贈書，明之詔諭使是否來日，不能無疑」。蓋此時室町幕府通明之道路爲征西府所阻。

洪武十四年（日本南朝長慶天皇弘和元年，西紀一三八一年），日本來貢，帝再却之。明史日本傳云：

「十四年復來貢，帝再却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并責其征夷

將軍，示以欲征之意。

通鑑明紀所載同此。貢使姓名不詳，但參考籌海圖編，其使乃懷良親王所遣之僧如瑤也。籌海圖編卷二倭奴朝貢使略中云：

「洪武十四年……十月國王良懷遣僧如瑤貢馬十四匹及方物，通有前來，人舡花名，乃命取赴京。宴賞歸國。」

圖書編卷五十日本考云：

「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

「命禮官移書責其王」，即所謂「設禮部問日本王」一文是也。此文見於高皇帝御製文卷二，其文云：

「禮部尚書致意崑崙答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險，巖頭石角為奇，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為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鳴蛙，仰鏡觀天，無乃構隙之源乎？恐王大略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國，上古勿論，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皇

明從信錄卷七亦載此文）

明史日本傳載日本懷良親王上太祖表云：

「良懷上言，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人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入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

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聞天朝有與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交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肢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極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就明史日本傳文義觀之，上錄懷良王上太祖之表，乃在接到「設禮部問日本王」之後而作答書，送此答書來華之使者是否仍為僧如瑤，不得而知，至其來華時間，似仍在洪武十四年也。是年日使來華凡二次。

懷良之答表，太不恭順，太祖覽之，甚為憤怒，但鑒於元世祖征日本失敗之覆轍，未能興師。明史日本傳云：

「帝得表，愠甚，終鑑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明史太祖本紀及日本傳，均未載洪武十五年日本入貢之事。圖書編卷五十日本國考云：

「洪武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是時胡惟庸死且三年矣。」

籌海圖編卷二倭奴朝貢事略云：

「洪武十五年入貢。」

使歸庭用入貢方物，屢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將歸庭用誣為倭寇，分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

明書（查東山之罪惟錄）太祖本紀云：

「洪武十五年三月，日本入貢。」

又同書日本國傳云：

「明年（洪武十五年）復來貢。於時有林賢之獄。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云。」

按洪武十五年，當日本南朝長慶天皇弘和二年，西紀一三三二

年。是年二月歸庭用復使明。至胡惟庸及林賢之獄，當於另文述之。

圖書編日本國考云：

「洪武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

籌海圖編則將此事記於洪武十六年之後。

「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之貢」。

寶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回就借精練兵

四百與僧如瑤來獻臣燭，中藏火藥，兵，意在圖亂。上大怒，

縱賢于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祖訓云：以日本隔海僻

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故不與兵致

伐，著爲訓章，絕其往來」。

如瑤此次假入貢之名而暗圖助胡惟庸，當在洪武十七年（日本

後龜山天皇元中元年，西紀一三八四年）。時惟庸已死數年矣。

明史日本傳云：

「洪武十九年，日本來貢，却之」。

使者姓名不詳。或亦爲征西府所派。征西府之使至此絕。

肆 太祖通倭失敗轉而備倭

明太祖於洪武元年決定通倭之政策，大約在洪武四年即轉變。

太祖通倭政策有三要點：（一）望其禁倭寇，（二）通商賈，（三）

循唐宋故事修好。

洪武四年以來，太祖對於日本南北朝分裂狀況，有了進一步的

了解，已經知道南朝征西府雖使節常來，但無通好而禁倭寇之誠意

，且有利用倭寇以闢財源之嫌。北朝雖願與明修好通商，並禁倭寇

，但道路爲南朝所阻。所以洪武四年以後，征西府來使屢因無表文

或不恭而被拒。太祖鑑於外交途徑到此已窮，轉而採取海禁政策，

努力海防，以備倭寇。洪武十三年以來，明廷雖與征西府來使虛與

周旋，但關係惡化，互以書信責難。及至洪武十四年明廷發覺征西

府遣僧如瑤以兵器火藥助胡惟庸，太祖怒，欲征日本，但鑒於元之

前例，遂不用兵而與日本絕，其著祖訓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

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列日本於十五不征之國。懷良親

王亦於洪武十六年死去，此後北朝勢盛，忙於國內之統一戰爭，對

明之交通，一時中止。

直至南北朝統一（西紀一三九二年）後，明建文三年（日本應永

八年，西紀一四〇一年），義滿將軍始有遣使入明修好通商之事。



● 視近的人勇田池本日 ●

美機偵察古巴問題之分析

陳紹賢

舉世關切的美古緊張局勢是否會惡化下去，形成前年十月危機的再現呢？它的關鍵，操在蘇俄。卡斯楚的對美戰略，還是在走莫斯科的路線；目前畢魯曉夫是不會讓他去闖禍的。美國的孤立古巴政策收效不大；美古交惡將在一張一弛之下，經過漫長的歲月。

壹 問題的發生

前週據外電報導，蘇俄將於數週內撤出駐古巴的軍事人員。但截至四月二十二日止，據美國務院新聞官麥克勞斯基向記者說：「華府未曾收到莫斯科有關從古巴撤軍日程的正式照會。」

美國為明瞭古巴境內俄軍的行動與飛彈武器的實況，曾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透過瑞士使館，照會古巴，聲明繼續實施對古巴空中偵察。

四月二十一日，古巴以兩項照會向美抗議，指稱美機飛行古巴上空為「侵犯古巴國家主權」。在照會發出的前後，卡斯楚及其外長羅亞和總統杜迪柯會先後發表談話或聲明，宣稱美國違反國際公法，侵害古巴主權；古巴將以正義與勇毅維護主權；美國對飛行所引起的任何事件，應負全責。

美國的立即反應，便是詹森總統四月二十一日答復編輯人等詢問時的聲明。他說：美國繼續在古巴上空從事偵察飛行「是必要的」。爲着要看「是否有任何新的攻擊性飛彈抵達該地」。又說：「阻撓此事的任何行動，將是一種十分嚴重的行動。」同日，美國務院發表聲明稱：「如果古巴攻擊美國的偵察飛機，古巴將遭受其後果。」

古巴當局重申反對的決心。是月三十日，卡斯楚聲明他將在「我們武力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試圖阻止美機之飛越古巴上空。」又說：「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及不管將有什麼遭遇，防衛我們的領土

主權。」次日，他在五一勞動節集會發表一長篇的反美演說中說：「如果終止美機飛行的談判努力宣告失敗，則古巴砲手將擊落在古巴上空飛行的美國飛機。……古巴決不准美國從事實地偵察，直到他們准許我們在佛羅里達上空從事同樣偵察。」

對這兩天古巴的政治攻勢，美國都有立刻的反應。四月三十日，美國務院重申美國繼續飛行偵察的立場。并引述詹森總統二十一日日的聲明，強調對監視飛行的任何阻撓，都將爲「一種極爲嚴重的行爲」。次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都聲稱，美國偵察飛機將繼續在古巴上空作偵察飛行。并作解釋的說：由於未能進行實地視察，作此種偵察飛行甚爲必要。關於實地視察一事，美國與蘇俄曾於一九六二年底達成原則上的協議，但是古巴始終激烈反對。

在這期間，雙方都已作應變的部署。古巴下令三軍準備阻止「美帝的侵略」。美國也動員數百架戰鬥轟炸機，分別集中於佛州的海空基地和附近港內的兩艘航空母艦上。

值此美古兩方「劍拔弩張」的情況下，黑魯曉夫五月一日的談話，使局勢更形緊張。他說：「對古巴之威脅，對其主權之侵害與領空之侵犯，將具有災難性的後果。關於此點，我們已經常提及，現願再予申明。」又說：「對於那些對古巴實施挑釁及侵略政策的人們，這將是一項空前未有的災禍。」

對此舉世關切的美機偵察古巴問題，有加以分析的必要——先從縱斷面去看它的背景，再就橫斷面去看它的各種因素，及其總結之所在。

貳 當前危機的背景

一九六一年一月間，美、古邦交的斷絕，為兩國新的惡化關係之開端。自此時起，古巴成爲蘇俄附庸的跡象，日見明顯。

美國爲了自身及西半球的安全，曾加緊訓練古巴的革命組織，企圖幫助他們去推翻卡氏政權。一九六二年四月豬灣登陸事件，原爲華府默許的軍事行動。但事發之後，白宮臨時改變支助的計劃，以致慘敗下來。當時美國的國際聲望大受打擊，國內的輿情也因失望而沮喪。蘇俄便乘機趕運攻擊性飛彈入古，并爲祕密建立若干發射基地，造成對美背後威脅的形勢。

華府逼得實施對古巴上空偵察，攝取了蘇俄武器和基地的許多證據。是年十月間，美國的一架U-2偵察機在古巴上空被擊落，證明了射擊的是俄製的飛彈。於是激動了美國人民的公憤。甘迺迪總統於是月二十日，宣佈對古實施「隔離措施」(Quarantine)——凡開赴古巴的船隻，必須受美艦的檢查。經證實無帶武器或軍隊，才予放行。同時他要求蘇俄撤回在古的飛彈設備與軍事人員。那時美國已動員三軍，準備應戰，顯示不惜一戰的決心。這是古巴危機的最高峯。

黑魯曉夫退却了。他答應撤回在古的飛彈設備和軍事人員；不再運入；勸告古巴當局接受美國的現場監視。同時他要求美國作不進攻古巴的承諾。華府接受了。這場極度緊張的局面便和緩下來。當時甘氏接受黑魔的條件，原基於一種了解，就是美國有權派員在古實地查察。後來黑魔以卡斯楚反對爲詞，使美國的現場監視不獲實現。華府不得不繼以空中偵察，以防飛彈武器的掩藏，或其發射基地的重建。

近年餘來，美國中央情報局陸續偵悉蘇俄的攻擊性飛彈與軍事人員運入古巴的實況。經美國多番提出交涉，沒有結果。最近莫斯科傳出即將撤軍及飛彈交古接管的消息。繼以古巴政權向美提出嚴重的抗議，以致黑魔發出強硬的幫腔，當然都非出於偶然。

叁 俄、古、美的個別戰略

目前人們關切的一個問題，就是：假如古巴接受了蘇俄飛彈，

美機偵察古巴問題之分析

擊下了美國飛機，是否前年十月的危機會再現呢？要探求此一問題的解答，有須先觀察俄、古、美三國個別的戰略。

首看蘇俄。

蘇俄要在古巴佈置飛彈基地，似乎政治作用大於軍事作用。因爲她運入古巴的飛彈，無論裝設得如何周密，總經不起美國的一擊。這該是黑魔最清楚的。過去他不得不以偌大的代價，去換得在美國背後的一個攻擊據點；其主要作用，在預作對美談判冷戰問題的政治資本。前年美國決心不惜一戰時，他撤出了，這是他的軍事的退却；同時，他取得了美國不進攻古巴的保證，這是他的政治的勝利。

轉變軍事價值小的古巴基地，而爲政治價值大的古巴基地。在過去年餘中，黑魔不但利用古巴傀儡的動作，去拖延撤回武器和人員的時間，而且利用這個經保證的安全的古巴，作爲滲透拉丁美洲的政治基地，及反美仇美的宣傳據點，都已有了相當的效果。這也都是他的戰略之成就。直至最近，蘇俄撤軍與移交飛彈的消息傳出，引起古美敵對形勢的緊張，也許是他的政治戰略之運用，要使美國人民發生一種感覺，以爲在古巴的飛彈，仍握於俄人之手，對於美國較爲安全。這樣一來，美國人就會默許蘇俄在古巴的飛彈設備和軍事人員繼續地留下去。

次看古巴。

前年十月蘇俄的「臨陣退却」，的確引起卡斯楚的惡感。北平匪幫曾趁機去爭取他。後來蘇俄一面軟化了美國的鬥志，一面承担了對他更多的軍經援助，於是古巴的附俄關係沒有動搖。

去年四月卡氏朝俄時，於二十八日在莫斯科公開宣稱：「古巴的社會主義革命免被帝國主義者摧毀，乃得力於蘇俄的援助。」又當去年七月間，古巴爲抗議美國凍結其資金，發致華府的照會中有說：「古巴繼續維持與蘇俄密切而不可毀滅的友好關係，因爲蘇俄是我們的的朋友，曾在革命的艱難時刻幫助我們。」這些對蘇俄感恩戴德的話，都是北平所不願聽的。

北平每謀擴大古美衝突事件，以圖從中離間古俄關係，而爭取卡斯楚，但都沒有見效。例如去年三月，美國貨船「佛羅里達人」號在古巴北海岸外公海上遭兩架俄製噴射機攻擊，經華府提出抗議

後，古巴政權照會向美道歉，并保證防止同類事件不再發生。又如今年二月間，古巴切斷美國在關達拉摩海軍基地的水源，一時雙方的敵對形勢十分險惡。終因雙方都能自我克制，危機就消失了。此二事例證明了古巴的對美戰略，合乎莫斯科的旨趣，而違反北平的意圖。上舉的兩件事例，可以佐證上述卡氏朝俄言論與古巴對美的戰略是中的附俄語調都是他們的由衷之言，也足以表明古巴對美的戰略是走莫斯科的路線，而不接受北平路線。那末，今日古巴抗議美機偵察的嚴重態勢，可能為配合蘇俄的對美戰略，未必志在造成嚴重危機。

最後，看看美國。

美國對古的戰略目的，無疑地在消滅卡斯特政權。正如甘迺迪於去年七月十七日記者會上宣稱：「美國不能與加勒比海的蘇俄附庸國共存！」不過，我們也可了解，美國為達此目的，不致直接使用武力進攻，而其戰略顯而易見：一是經濟封鎖古巴；二是政治戰略，為建立西半球的聯合陣線，以孤立古巴。

美國自實施對古經濟封鎖以來，得失互見，去年古巴與世界各自由國家的貿易總額，僅二億五千餘萬美元，比較與美絕交前一年的此項貿易總額減少了四分之三以上。這是經濟封鎖的成效。但美國的這種措施，失却許多盟國與友邦的支持。英、法、西班牙、摩洛哥和南斯拉夫等國都不顧美國的抗議，而繼續與古貿易，逼得華府宣告停止對她們的軍經援助。因之更引起了她們的反感。尤其是英國，她於對古貿易關係上與美國的政策衝突，迄今未能協調，暴露了西方團結上又一弱點。

團結拉丁美洲，以孤立乃至窒息卡氏政權，這原為美國的主要戰略。豬灣事件失敗後，甘迺迪宣佈的「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計劃，要以基金三十億美元的四年援助方案，配合「糧食和平」計劃等，以加速中南美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使各受援國都能繁榮與進步，免為共產主義成長的溫床，并從根本上防止任何類似卡斯特政權的出現。這是它的長程目標。至於它在當時的緊急作用，純為從經濟的援助，去促成西半球反共與非共國家的團結，共同為孤立卡氏政權而努力。所以「進步聯盟」計劃可謂為美國對古戰略的基石。

兩年餘來的事實，證明「進步聯盟」的宗旨幾成空想。拉丁美洲國家對於美國的古巴政策未能一致支持，為此計劃失效的主因。在美洲國家組織(O.A.S.)的歷次理事會議及部長會議中，關於制裁古巴的提案，無論為斷絕外交關係，或為斷絕商務關係，或為限制赴古的旅行，或為嚴密各國間的安全聯繫，都難得全體一致的通過。因之，數月前華府已暫停止透過泛美組織去實施其對古戰略了。

肆 從國際法觀點看飛行偵察事件

由上述古巴當局的談話與聲明，及其向美抗議的照會，參證去秋古巴向聯合國第十八屆大會提出控訴「美國侵略」的文件中指稱美機侵犯她的領空主權，再看最近古外長致聯合國祕書長的冗長說帖，也以侵犯領空主權為主要理由，要求他向美交涉阻止，可知關於反對美機飛行偵察，古巴所持的主要法律根據，就是「侵犯領空主權」。這是一個國際法上的問題。

前年十月，古巴打下美機U-2後，甘迺迪總統宣告美國決策的演說詞，意旨堅定，而措詞委婉，且處處有自衛意義的含蓄——不用「封鎖」，而用「隔離」，也是為此。本年四月廿一日，詹森總統的聲明，已見上述。他說，偵察飛行「是必要的」，因為要看「是否有任何新的攻擊性飛彈抵達該地」。這也是表明為了自衛的緣故。「自衛」也是國際法上一個問題。

現在試從國際法的觀點，看看古、美雙方的法律立場。

一次大戰後，因航空事業漸形發達，各國對領空主權問題，有了一種共同的認識：國家在其領土與領水的上空有領空權；這種領空權亦屬於各該國的完全主權。這一原則已被公認為國際法的一項原則，因為各國訂立的航空公約，都以此為其規範。只舉在美洲簽訂的兩種公約來看罷：一九二八年，美洲各國在古京哈瓦那簽訂的「航空公約」，規定「國家主權及於氣空(Airspace)」；一九四四年，美國邀集五十多國在芝加哥簽訂的「國際民航公約」，也載明「簽約國對其領域以上的空間，有完全而絕對的主權」。依此看來，古巴以美機飛入她的領空，是侵犯她的主權，顯為合乎國際法

的指稱，可無疑義。

或以爲「領域的上空」如無限制，則「無限上空」是否包括「太空」(Space)呢？自一九五七年蘇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 Sputnik-1 射入太空之後，國際法學者對於「上空」與「太空」的分界及太空自由問題，更加注意研討了。

國際間關於太空自由問題的研討，大致已獲定論。早在聯合國第十三屆大會時已通過美國等二十國的「和平使用太空」建議案，也就是接受了「太空自由」的原則。一九六〇年，國際法學會在西德集會，也通過一項議案，主張太空與天體應不屬於任何國家的主權範圍。

國際間對於「上空」與「太空」的界限問題，則意見分歧，尙無定論。比較折衷之說，便是主張：距離地面五十哩爲地面國的主權範圍；由五十哩至六百哩高度的空間，視作鄰接範圍，各國航空器有「無害通過」之權；六百哩以上爲太空，各國得自由和平使用。但因牽涉若干技術問題，此說未能獲得公認。一九六一年美國發射的通訊衛星，飛經蘇俄的「高空」，蘇俄曾提出抗議。可見「上空」與「太空」的界限，不純是一個技術問題了。

現在美機U-2的飛行高度，大都在七萬呎左右。這是在所謂「距地面五十哩」的領空範圍內。美國當不以「距離問題」去應付古巴的法律性挑戰，而以「自衛」的法理，作偵察飛行的維護，這也是值得重視的。

任何國家有她的自衛權，這是國際法上公認的原則。不過，對於「自衛」的解釋，每因學派之不同，或國家政策之衝突而差異。一九六二年，國際聯盟理事會一致通過的一項解釋：「合法的自衛，包括剛對付攻擊的嚴重性，而採取的手段。這種手段的使用，只適合於立即的危險。」這種解釋，仍爲一般學者認爲比較合理。但是，在這核子武器時代，此一解釋對於使用合法自衛的國家，未免太爲難了。

美機偵察是被逼行使的。假如黑魔實行他前年十月對美的承諾，尤其是美國已得現場視察，則她的飛行偵察，當然是侵犯古巴主權。現在的事實是：黑魔不但不實踐承諾，反而有違背承諾的行

爲。蘇俄在古巴暗中佈置的飛彈放射幕，早已被美機所發現。美國隨時有遭受嚴重性突擊的可能。如果視預防性的飛行偵察不合「自衛」，到了被突擊時才去還手，那就不是「自衛」，而是「報復」了。所以從國際法觀點看，美機在古巴上空的偵察飛行，可認爲一種預防性的自衛行爲。

伍 結論

綜上分析，美機偵察古巴問題，是個國際公法問題，也是個國際政治問題。只從國際法觀點去研究，那是一種法理的探討。二次戰後，冷戰集體思想衝突的緣故，國際法的基本觀念已是分歧，今日尤甚。對本問題的法理看法，當也難免有所差異。十二年前，筆者曾譯美國威爾克教授(Prof. Kurt Wilk)的「國際法與全球性的觀念衝突」一文，刊於「大陸雜誌」。現在摘錄一段，作這點觀感的註解：

「關於國際法的標準，蘇俄共產主義的想法，如概見於哥羅文(G. A. Korovin)和巴許幹尼斯(E. B. Pashukanis)的著作中者，其理論的互相更迭，表明對一種固定的論據，作不斷的改變。蘇俄那樣體認的國際法，自與資本主義國家已成立的定義不能盡同。在任何期間，敵對政策發展的廣狹，敵對主義尖銳化的程度，自會影響到她們對國際法歧見之大小。蘇俄對國際法原理之繼續變更，爲的要就國際法的性質和範圍中，去說明一種理論，既能與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相符合，也能與他們現在的外交政策的急需相調和，并儘可能使這種理論頭頭是道，聳人聽聞。現在他們最有權威的作家，對於所謂無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可有共同價值的理論，特別加以否認或譏笑，只就有利於無產階級或法西斯的去闡揚。」(見「大陸雜誌」第四卷第十二期—四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因此之故，從國際政治觀點，去看飛行偵察事件，較能明瞭其全貌。由上面對俄、古、美三國的戰略觀察，可知美古的緊張關係是否將趨惡化，其主動操於蘇俄。目前蘇俄內有經濟的困難，外有